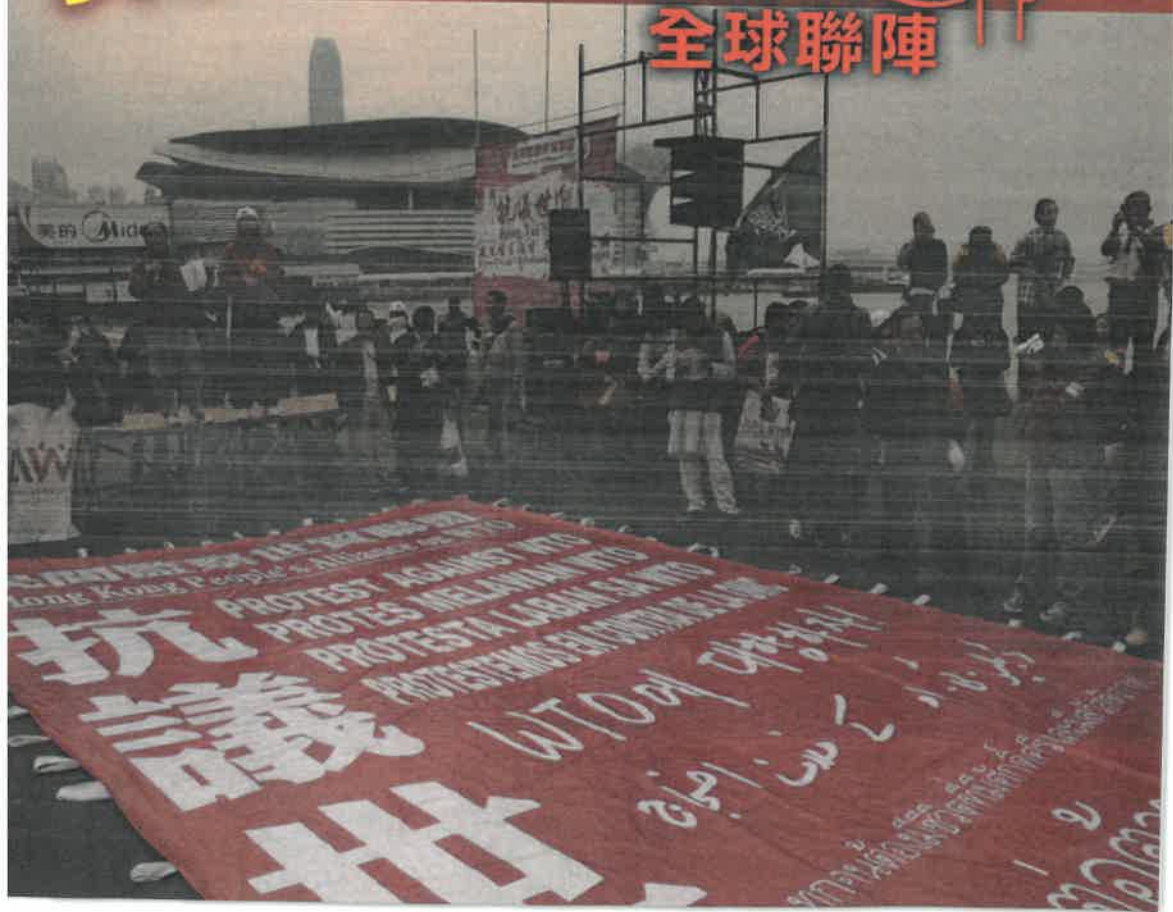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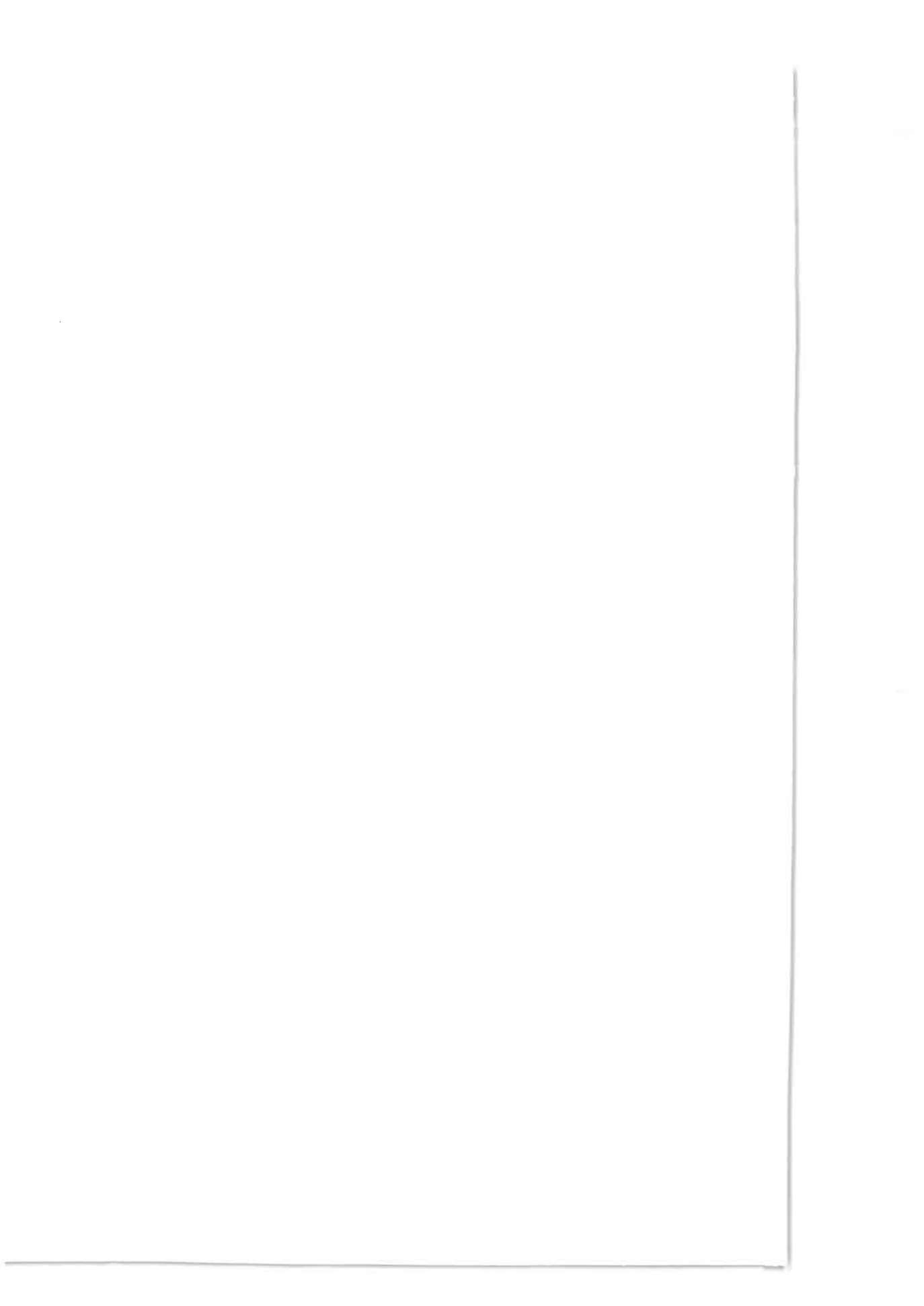




# 那年十二月， 我們抗議世貿

HKPA   
全球聯陣





那年 十二月，我們抗議世貿

---

監察全球化聯陣

## 那年 十二月，我們抗議世貿

文稿策劃及編撰：監察全球化聯陣

文稿修訂：方蘇

插圖：志明

設計：qwert852

圖片：監察全球化聯陣、香港職工會聯盟、  
自治八樓（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

出版：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田灣田灣徑 9 號新英工業中心 8D

電話：2555 6335

傳真：2555 3870

電郵：sforward@netvigator.com

網址：www.stepforwardmultimedia.com

©2006 監察全球化聯陣

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電話：2838 1699

出版日期：2006 年 12 月

版次：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962-8326-80-5

定價：HK\$40

前言	鄧燕娥 監察全球化聯陣主席	4
一個各國民間團體聚合的平台		6
世貿與香港：多元化的公眾教育		10
聯盟的傳媒策略		21
漫長的爭取釋放運動		29
由抗議活動演成的政治官司——一個律師的回顧		36
差異與希望——一個局中人看反世貿及國際運動的未來	譚駿賢	44
附件一：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組成及架構		52
附件二：就舉辦「抗議世貿！——民間活動週」的立場		55
附件三：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大事表		58
附件四：「抗議世貿！——民間活動週」活動地圖		62

# 前言



鄧燕娥 監察全球化聯陣主席

抗議世貿之後，我們都有很多記憶。執筆和提供資料的美寶和穗珊，在那段日子裡，是與我最緊密作戰的姊妹。在我們的腦袋裡，肯定有着很多相同的片斷，連起來或可成為一幅完整的圖畫。我們都希望這些片斷不會因為時間消逝而被人甚至是被自己遺忘，因為這些片斷對我們自己固然非常重要，同時對日後推動社運全球化的運動和工作也會是非常重要的。

相信最多人記得的片斷是2005年12月17日黃昏，抗議人士在灣仔街頭與警方對峙的一幕。這是最具爭議性的一幕。社會上有人罵韓農搞事，太多暴力；但也有人認為他們是為了生計而鬥爭，值得同情。在抗議世貿的民間團體中，有人問：為什麼他們（韓國人）行事老是那麼突然，永遠獨行獨斷？但也有人說：我們終於抗議了世貿！

縱然在抗議時真的有過武力衝突的場面，但這場抗爭行動並沒有令灣仔區市民的財產遭受破壞，也沒有導致任何人嚴重損傷。因此，只能說這是一場有過激烈行動的和平抗爭。

在民間活動週那一個星期內的遊行、論壇、大大小小的會議、文化表演等等，對於在會議展覽中心場內出席世貿會議的各國高官簡直是搔不着癢處。他們在會場內通過了宣言，讓跨國財團可以大搖大擺、肆無忌憚地進入地球上任何一個地域，去掠奪本來屬於生於斯長於斯的當地人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對於這種暴力，人民是憤怒的，抗議世貿的人是憤怒的，我是憤怒的。12月17日在灣仔的抗爭，使我們整個抗議世貿的運動顯得更為完整。

但身為民間活動週的主辦團體的主席，有些時候我也會感到極度困惑。

12月18日晚上，我拖着極度疲乏的身軀，與百多名民間團體人士站在觀塘法院門外。這群人中，有人說英語，有人說西班牙語、韓語或廣東話，大家都在不停地問：被拘留在內的人情況怎樣？可否入內探訪？為什麼不可以？誰人可以答覆查詢？……那時我想，十多天來，我一直期待這一晚終於可以好好睡一覺，而我這一刻竟是站在觀塘法院門外，還要回答一些我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的問題。同時，我腦子裡還意識到，一場新的抗爭即將開始。不同的是，這次抗爭，我事前完全沒有作過準備。在那時那刻，我竟然也會想到：假如我從不認識他們（韓國人），那該真好！

那是我畢生難忘的時刻！

之後，幸好有大律師黃瑞紅和李柱銘以及一眾民間團體接棒和努力，最後所有被控的示威者均無罪釋放，令這場抗議世貿的運動畫上美麗的句號。

抗爭過後，聯盟及本地很多民間團體與韓國的民間團體建立了很深厚的戰友情誼。這是整個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收穫。

回想起二十三年前，當時我擔任國際公教學生運動的亞洲區幹事，因為支持韓國的民主運動，曾多次到當地參加天主教學生團體主辦的民運活動，還替一些團體偷運被禁的書籍和文件。在最後一次訪韓時，我被南韓的秘密警察拘禁在一間昏黑的房間裡連續盤問了八小時，離境時更被警告日後不要再踏足南韓。前事後事，令我想到，韓國人與我真的有緣。

「世界社會論壇2005」動員國際  
團體來港抗議世貿(2005年1月  
26至31日·巴西)

fórum  
SOCIAL 2005  
muNDIAL  
UM Outro mUNDO é POSSÍVEL



## 一個各國民間團體聚合的平台

2005年底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或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簡稱MC6),會期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星期,但本地民間團體為了回應這次會議卻花了不少心力和時間。早在2004年7月,各個民間團體已召集會議,關注此次世貿會議的進程。民間團體對抗議運動應該達成什麼目的,彼此意見有重大差異,結果是意見接近的才走在一起。

當時,香港的一些工會和基層團體,如香港職工會聯盟、街坊工友服務處、基層發展中心、深水埗社區協會等,已組成「全球聯陣——勞工基層大聯盟」,批



判私營化、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對勞工階層及基層的影響。為了壯大民間抗議世貿的聲勢，於同年9月成立了一個包容性較強的平台組織，定名為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簡稱聯盟或 HKPA）。聯盟成立初期的核心團體共有十多個，當中為數不少是職工盟的屬會。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旨在團結大多數，但卻有人認為聯盟的旗幟不夠鮮明，也有團體覺得聯盟太激進。聯盟主席鄧燕娥只能說：「我們不反對個別團體有獨特立場。但作為聯盟，如果立場太極端，不但有礙聯盟的擴展，亦不利於進行公眾教育。其實大家對世貿的認識都很有有限，一開始便喊『打倒世貿』會嚇怕人。」那時她只有一個期望：在世貿會議結束後，民間團體還願意繼續探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那就最好不過了。

聯盟的第一個任務是籌款。第一筆款項來自香港樂施會，二十多萬，只可用作公眾教育。後來得到海外盟友的協助，籌得一萬多美元，拼湊起來請了兩位職員：區美寶和胡穗珊，並且馬上展開工作。

聯盟作為一個新組成的團體，在國際運動上的知名度不高，要爭取處於光譜上不同位置的國際運動團體信任，繼而一同尋求合作共識，並不容易。聯盟的成員團體雖然各自有其國際網絡，但外界卻並不了解聯盟本身。為了讓國際友好了解聯盟的宗旨及方向，聯盟把握了2005年世界社會論壇的時機，製作小冊子及舉辦座談會，以宣傳聯盟的工作計劃，並知會國際協調網絡會議的參加者，為抗議世貿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民間活動作準備。

國際協調網絡會議有 270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的代表參加 (2005 年 2 月)



2005年2月，聯盟主辦國際協調網絡會議，共有一百三十多個本地和海外團體共二百七十人參與。後來，由國際友好告知，是次會議得到國際團體的參與及認同，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香港的民間團體可以整合成一個聯盟，讓國際團體有一個清晰的焦點，而且聯盟的宣傳及準備工作亦頗有系統，即使首次與聯盟接觸亦有信心參與會議。這是一個值得記取的經驗，有助香港的社會運動團體舉辦國際活動時作參考。會議期間，參與的團體對世貿極力批判，大部份與會代表認為國際貿易已足夠開放，甚至早已令很多國家的人民陷入民不聊生的狀態，不可能再開放。特別是教育、醫療、食水、能源及郵政，他們認為一定不能列入開放項目。

由於這是民間團體的第一次合作，很多細節還要溝通。即使同樣是民間團體，彼此關注的重點和工作方法也不一樣。歐洲不少民間團體已是建制的一部份，傾向以遊說方式跟世貿組織談判。但大部份發展中國家的民間團體，根本連表達意見的機會也沒有，更遑論遊說。即使來自同一國家的團體，也不一定完全同意彼此的抗爭策略。

這次國際協調網絡會議定下三個共識：

1. 籌劃一個「民間活動週」(People's Action Week)。
2. 聯盟是一個讓大家聚合的平台，只負責統籌12月11、13和18日三場遊行示威。參與團體可各師各法，聯盟盡量不介入團體間立場上的差異。
3. 所有活動以非暴力方式進行。

另一方面，聯盟與國際盟友取消了由國際協調網絡作最終決策的構思，取而代之的是較機動的工作小組運作模式。為此，會議共成立了六個工作小組，負責教育、行動、傳媒、國際聯繫、籌款和統籌，並以電郵及電話會議傳遞消息。特別是國際聯繫小組，在會議過後至民間活動週的一年中，不但協助處理聯盟與海外團體的溝通工作，也使不少海外團體認識了聯盟，並動員國際團體來港參與民間活動週。

聯盟為了擴大連結面和加強動員，除了2月的國際會議外，又不定期地出席了世界各地的動員會議，包括南美洲、南亞及日本等地的會議。同時，聯盟亦派代表出席亞洲地區一些大型的民間活動及不同界別的地區大會，如在南韓釜山抗議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的活動及在泰國曼谷舉行的G-CAP全球減貧運動動員會議，通過與國際伙伴的聯繫，交流最新的活動消息。

總結經驗，在舉辦國際民間活動時，尊重不同團體間的差異，以及有條理的動員，對於是否能夠吸納更多的參加者是非常重要的。聯盟本身當然不可以沒有立場，但在組織活動和公眾抗議活動時要時刻警覺活動的包容性有沒有受影響。當然，這點亦與聯盟的能力有關，因為這種相對開放的平台式設計，同時可以減低人力的消耗，從而將力量集中在統籌工作上，並且可以減少不同團體之間的論戰。





世貿與香港：

## 多元化的公眾教育

在香港，有關全球化的公眾教育其實早在 1999 年已經開始，由一個民間組織「全球化監察」（後來成為聯盟的一個積極成員）所推動，以出版期刊、工會教育及講座等不同形式進行。其後，針對 2001 年 1 月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民間社會開展了一個「反全球貧窮化陣線」，就全球化的問題進行教育及組織抗議行動。

2004 年底，各民間團體籌備成立民間監察世貿聯盟時，大家認為要在香港推動對全球化的批判，需要更廣泛的教育才可以得到公眾的支持，於是向本港一個發展及救援機構香港樂施會申請了撥款，開展針對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而起動的新一輪教育活動。除了要建構一套以基層的角度及權利為本的分析工具之外，聯盟的教育工作更着重於動員民間團體的網絡及力量，強調連結世貿與民生及基層的關係。聯盟一方面爭取教育其組織對象認同世貿和全球化與香港市民息息相關的说法，同時雙向地汲取工友、街坊的經驗，從而豐富本身對政策影響的理解，再進一步透過遊說、行動等不同的倡議方法，去影響政府的決策；最後亦會使用遊說的



成果或所得的資料，進一步將之融入教育及動員工作中，力求做到「教育 - 動員 - 倡議」三者互助互長的良性循環。

由關注本地為原則出發，聯盟舉行了七次工作坊，題目涵蓋《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Services, 簡稱 GAT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簡稱 TRIPS)、《中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簡稱 CEPA)、食物安全、農業等各方面的問題。工作坊的規模有大有小，大型者如 2005 年 10 月 15 日舉行的「亞洲農民之聲——交流論壇」，約一百二十人出席；小型者如 CEPA 議題，約廿人出席。(詳見附件三：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大事表)

雖然出席工作坊的人數較預期為多，但主要來自社會運動團體，亦即只能動員團體組織者或核心成員，未能做到廣泛動員公眾的效果。換言之，工作坊最大的作用並非進行廣泛的公眾教育，而是透過邀請與主題相關的團體參加，聯盟促進了不





同團體之間的彼此認識與經驗交流，並進一步令世貿協議與香港的關係更清晰地展現。

例如，聯盟曾以兩次工作坊講述 TRIPS 的版權條例，當問題到了香港的教師身上，便凸顯了在某些世貿條款中理論與日常運作之間存在着理解上的差距。

版權究竟如何界定，又能否無限擴大，都成為困擾教師的問題。聯盟的統籌胡穗珊記得，在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合辦的工作坊上，有前線的老師把世貿條款放在課堂的背景中，表示憂慮把學生作品貼在壁報板上會侵犯了學生的知識產權，甚至提到要發家長信徵求同意。不消說，老師的反應雖然顯得過敏，但卻顯示了世貿的有關條款中理論與實際操作並非毫不相干，而公眾教育之重要，便是將兩者互相連結，以了解世貿對一般市民的影響。

世貿組織帶來的影響，在全球各地引起了種種反應。其他國家針對世貿的抗爭方式，能否完全套用於香港的處境上呢？

在聯盟主辦的工作坊上，香港樂施會及無國界醫生的代表曾講解在泰國及南非推行得相當成功的「病者有其藥」運動。這個運動旨在爭取容許發展中國家使用配方藥，以免病人「無藥可醫」。出席這個工作坊的人，有向來與社會運動較為疏離的病人團體。雙方交流後，發現在香港現有的醫療政策下，由於香港已不屬發展中國家，TRIPS不容許生產配方藥。以愛滋病為例，雖然香港的病人並不至於完全得不到藥物救助，可是在醫院管理局制訂的《藥物名冊》上，很多新研發的貴價藥物因為尚未超逾TRIPS保護的二十年專利期，都不會列於政府資助名單之上。於此而言，就不可以僅是要求改善補救條款而不直接挑戰藥價與知識產權的問題。由於知識產權條例對於藥物的影響，在香港需要一套不同的策略去為病人爭取權益。

在關於食物安全的工作坊上，全球化監察的講者區龍宇仔細解釋世貿條款如何在食物衛生及檢疫層面上置公眾利益於不顧。他指出，世貿組織往往將檢疫條款或食品安全視作貿易障礙，而積極將之消除。例如在1996年，使用激素飼養食用牛隻的美國和加拿大，就曾向世貿組織控告歐盟禁止進口含激素的牛肉，指其違背世貿協議，結果歐盟被裁定敗訴。可是，同場演講的負責食品安全的食物環境衛生署

官員卻顯得自我保護，處處辯稱世貿組織並無干擾香港的食物檢疫機制。對於香港缺乏針對基因改造的食品的說明標籤，這位食環署官員指稱這是香港政府原來的政策，是政府認為無此需要，與世貿組織無關。在同一工作坊上，有食環署職員訴說該署職員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難，反映出香港政府的做法與世貿組織的信條共通。原來食環署削減了約百名前線衛生督察的職位，使得留在崗位上的員工工作更形繁忙，更見辛苦。他們過去巡查一個處所，往往查視十多分鐘，如今卻要在幾分鐘的時間內完成。這套所謂提高成本效益的政策，其實是出於削減開支。這種做法可能正暗示着，在信奉「小政府、大市場」的香港，世貿的信條並非舶來品，而是與香港政府等同！

正是透過這次公眾教育的機會，由這位食環署官員表露了香港政府反對食品標籤的立場：因為食品標籤能有效地區分經基因改造的食物，會損害企業的利益，故此被棄而不用。這位官員的說法，使香港政府抱擁世貿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立場暴露無遺，甚至讓人見到香港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比起世貿組織可能猶有過之。

聯盟除了舉行面向公眾的工作坊外，亦為個別團體「度身」設計講座，其中一次是為仁愛堂四十多位婦女參加者舉辦的工作坊。這些婦女大多來自基層，有些還要領取政府發放的援助。她們只是對世貿組織感到好奇，真正的興趣本來不大。但在工作坊的分享環節中，她們卻發現世貿推動的貿易模式正好與自己在仁愛堂參與的「共同購買計劃」相反。她們關注種植蔬菜的農夫的工作狀況和種植方法，希望透過直接購買去減少中介者的中間剝削及保證食品新鮮。也就是說，她們認為首要的是勞工權益及食物安全。可是，在世貿體系之下較為有利的大規模農場生產與貿易方式中，卻難以追蹤食物生產的源頭及得知在生產過程中勞工的狀況。這種情況激發她們關注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於是，公眾教育產生了新的化學作用：透過一個議題對公眾具體生活的影響，將抽象的條文轉換成生活化的和可理解的經驗，從而引發思考。

作為前期工作的工作坊與座談會舉行多次之後，聯盟便組織了社區推廣工作。首先是在 2005 年 7 月 17 日舉行的大型教育活動，動員約二百人到銅鑼灣行人專用區，邀請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聯盟主席鄧燕娥等出席論壇，與公眾討



論世貿對香港的影響。為此，聯盟還製作了相應的道具，如單張、展板、大型的地球氣球，並在集會完結後舉行了一場小規模的遊行。同年11月17日，聯盟又於旺角舉行了另一次類似的社區推廣活動。為了借助社會及傳媒對於向世貿抗爭的興趣，以推動更廣泛的公眾教育，聯盟中幾個成員團體與秘書處聯合製作了《誰的全球化？》教材套，供中學通識課程使用，並舉辦推介會。這個教材套以不同的題材切入，讓教師可以在校園內從不同的角度與學生討論全球化的問題，推廣批判世貿及全球化的訊息。

在眾多教育工作中，對外地傭工的教育及動員亦很重要。世貿會議的討論內容，影響全球經濟利益如何分配，對工人、農民、漁民的生計有直接關係，因此是國際勞工運動團體關注的重大議題。早在2004年，以香港為基地的外移勞工團體已密切關注世貿會議的進程。當世貿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決定在香港召開後，香港的幾個外勞團體，包括亞洲外移勞工陣線（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簡稱APMM）、亞洲移民人士聯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簡稱AMCB）和亞太殺蟲劑行動網絡（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 Asia Pacific，簡稱PANAP）隨即在2004年9月舉行了研討會，與會者都是亞洲地區的外勞領袖，大家都有興趣探討世貿談判如何影響在港工作的二十五萬亞洲外移勞工。研討會過後，幾個外勞團體隨即加入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並在其後的抗議運動中扮演了積極角色。APMM的行政總監



掙開世貿枷鎖，建設平等公義社會(2005年7月17日)



Ramon Bultron說，外勞團體組織了一個十星期的倒數活動，目的在於教育香港的外移勞工，世貿究竟和他們有什麼關係，以及世貿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

2005年12月11至18日是聯盟的民間活動週（People's Action Week）。在活動週前的十個星期，外勞組織每逢星期天便在中環宣傳抗議世貿的訊息，希望世貿成為在港外勞的一個談論話題。宣傳活動的內容與本地外勞一向關注的問題緊密相扣，譬如討論加薪和勞工及就業保障是否足夠，全球化對外勞及其家人有什麼影響，等等。除了人與人之間通過口頭的接觸外，外勞組織還設計了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動，以輕鬆的手法切入議題。有人扮演三隻猴子，代表自由化、私有化及解除規管（deregulation）的惡果；又有世貿小姐選舉諷刺劇、進步歌曲晚會和反世貿嘉年華等等。Ramon表示，透過軟性教育活動，外勞明白離別親人到異鄉工作是全球化的後果；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外勞得知任何影響本地社群的政策，最終也會波及外移勞工，因此團結一致抗議世貿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本港一些關注外傭權利的機構，如亞洲外移勞工中心（Asia Migrants Centre，簡稱AMC）、印尼和菲律賓的外傭工會等，亦舉行不同的內部培訓活動，並經常在大型活動中向外傭講述世貿協議的禍害。

在民間活動週期間，由聯盟舉辦的三次大遊行中，共有超過二千名外勞參與，



演出街頭劇，諷刺世貿和新自由主義殘害人民（2005年7月17日）

聯盟聯同農民團體抗議世貿部長級會議（2005年7月24日）



CEPA工作坊的參與者聚精會神，留意講者的分析（2005年3月11日）



抗議世貿談判黑箱作業（2005年7月24日）

觀察預備會，講解抗議活動須知 (2005年11月)



悼念世貿受害者的燭光晚會 (2005年9月10日)



外傭以富特色的道具抗議世貿  
(2005年12月11日)



在世貿面面觀工作坊中，小組討論的  
情況很熱烈 (2004年12月15日)

大部份是菲律賓、印尼和泰國的家務傭工。12月17日，外勞又到菲律賓、泰國、美國領使館及香港政府總部，就不同事件進行抗議。多個外勞團體又合辦工作坊，討論《服務業貿易總協定》中有關自然人流動的服務模式，以及如何發展國際外移勞工網絡。

外移勞工的積極反應，加強了外勞與本地社群的關係。Ramon說，外勞從前也有就個別事件表示意見或者以集體行動抗議，然而抗議世貿是一個讓所有外來勞工團結在一起的機會，也是第一次集體面對國際性的政策。

在進行團體及公眾教育的同時，聯盟自2005年1月開始就定期約見政府官員、工業貿易署及世貿會議統籌辦公室的代表，一方面表達對世貿談判的意見，另一方面亦為會議期間的民間活動作準備。在多次會議及約見的過程中，一如其他社會政策那樣，政府對民間的意見甚少接納。工貿署更常以「政策由政策局決定，工貿署只是執行」為口實，去推搪政府在世貿談判中黑箱作業及不得民意認可的問題。而政策局更是多番拒絕民間團體的會面要求，足見其官僚氣焰。但多次與官方的會面，令聯盟了解到與政府談判的幾個重要條件。

在其中一次會面中，聯盟連同二十多個不同的公務員工會代表出席。在會面過程中，工貿署的代表顯得十分緊張，一見面就急不及待地表明不會就郵政服務作出任何承諾，而聯盟這邊正好有一名郵政工會的代表在場。由此可見，民間力量要令政府在磋商過程中感受到壓力，能動員受影響及具代表性的團體出來爭取是十分重要的。公務員因為是政府體制內的僱員，對於政府的工作範疇及流程十分熟悉，才會令工貿署的官員格外審慎。

因為政府拒絕提供全面的資訊，曾令聯盟的監察受到阻礙。其後，聯盟透過成員的國際網絡，取得港府呈交給世貿的《服務業貿易總協定》談判中的減讓清單，大大方便了聯盟了解談判的內容，擴大了聯盟與工貿署討論的空間，也加強了在內部進行動員的能力。但是，僅是書面的資料並不足夠，聯盟鑑於紐西蘭與香港有相似經驗，邀請了紐西蘭的學者兼民間團體代表，向聯盟的成員及公務員工會講解如何解讀資料的竅門，並有機地連結當時的談判重點，令聯盟得以與政府進行更深入的對話。



在與工貿署的對話過程中，聯盟發現了政府在談判上的很多盲點。聯盟透過教育工作和團體連結的過程了解到，政府官員在與基層團體或工會代表會面時，經常說團體的訴求違反世貿協議，以此否定爭取改善的可能性。其實，工貿署官員否認自由貿易協議的負面影響是不確實的。例如，食物環境衛生署管工職系工會與署方開會，要求加重對違法外判商的罰則時，食環署的官員就以違反世貿自由貿易協議為理由而拒絕。又例如，婦女勞工協會推動社區回收膠樽，並遊說把回收塑料後再造的垃圾袋供政府的房屋署及食環署採購使用，但廠商卻說政府以不符合《政府採購協議》為理由，拒絕了這個勞工、環境、業界、居民同時得益的多贏方案。當團體代表與政官員對話時，舉出以上這些實證。官員難以回應，只能否定事件的真確性，甚至推說是其他部門的理解有誤。

與政府會面，對聯盟的內部教育及動員也有幫助。與政府的談判，有助於與聯盟外的團體和工會建立更多連結的機會，取得更多合作及對話的空間。在這個過程中，既可取得更多有關政府進行世貿談判的資料，亦可以用於進行教育，令受眾更具體地了解政府在貿易談判中如何操作，以及相關的影響。

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聯盟總算可以總結出一些聯繫到香港的經驗，用作批判世貿的論述。通過教育和倡議，聯盟爭取到民間團體對世貿議題的關注及投入。在民間活動週期間，聯盟動員到超過三百名義工及糾察，在維園這個主場地及抗議過程中提供不同形式的協助，當中不乏熱心市民和學生。義工參與的工作範圍極廣，由場刊設計、場地支援、宣傳、表演、翻譯，甚至搬運、救護及在行動現場提供種種協助。很多義工更婉拒聯盟補助其交通、飲食開支的津貼，可謂出力又出錢。在民間活動週的三次大遊行中，參與的本地及在港外傭，人數達七千多人次，是本港多次關注全球化群眾運動中動員人數最多的紀錄。

2005年12月15日，韓國農民示範了香港社會運動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破格儀式：他們在街上三步一叩地遊行示威。聯盟負責統籌工作的胡穗珊和區美寶參與了行動之後，在銅鑼灣一家食店進餐時，已經疲累不堪。這時她們竟聽到背後兩名男子的對話，評說韓農行動的因由：「都是因為世貿全由歐盟與美國玩晒啦！公平貿易？哪有這回事？」

由此對話，可見社會大眾對於「世貿等如公平貿易」持質疑的態度。這並不只是單純受到韓農的遊行方式所感動。在港言語不通的韓農，其實很難直接申訴，但長時期以來民間的團體多元化公眾教育，縱使初期的效果很微小，但已為運動打造了基礎。因為聯盟不斷提出世貿的不公平和不公義，而誠意又為人所感知，所以在韓農做出特殊的舉動時，公眾的認識便跨越了隱而不見的界線，受到感動。如果沒有之前的公眾教育，或沒有這次反世貿抗爭，就不會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的氣氛。這樣一來，世貿議題就仍然將會是局限於社運的圈子而不為大眾所關注。

當然，聯盟在事後檢討之時，就香港一般市民參與不多的情況也作了反省。聯盟希望可以持續對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作出批判，加強公眾對議題的認識及參與。畢竟，這個運動在香港尚處於起步的階段，接下來的一步是要鞏固市民對抗爭的認識，將公眾對世貿的理解轉化為自己熟悉的切身感受和經驗。具體的教育工作可以是與宗教團體合作，從貿易與公義切入，提出信仰與公義的關係。在學校推行通識教育時，以這次運動作素材，教學生去作支持及反對世貿的正反辯論。在工會，可以反思工會運動與反世貿運動的關係。聯盟亦應着手於理論的探討，將世貿代入香港實際經濟發展與政治運作的層面，了解新自由主義如何強調個人責任而忽略社會責任，「小政府、大市場」政策的原素及影響，等等。總之，聯盟要通過持續和深化的教育，從而在多方面將這次抗議世貿的運動作進一步的提升。



《我們為什麼抗議世貿?》小冊子

## 聯盟的傳媒策略



在圓桌會議上向世貿總幹事抗議(2005年10月16日)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傳媒工作小組負責人之一區美寶說，聯盟一開始已有意識地部署傳媒工作，然而真正實行時，無力感卻成了最大的困難，因為傳媒有自己的運作慣性。

傳媒小組另一成員林英卿補充了區美寶所指的「運作慣性」：香港傳媒處理新聞時過份流於「即食」，只着重翌日見報的效果，以市場之名將議題簡化，甚至把新聞套入自己設定的敘事方式，對問題的分析流於平面及單薄。

2005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MC6)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香港政府作為東道主。民間監察世貿聯盟負責協調各國抗議世貿的團體於香港進行活動，亦負有向社會公眾解釋各種活動之意義的責任。其中一個途徑是借助傳媒以發放信息，深化有關議題的討論，促進社會對世貿的了解。然而，在傳媒工作的策劃與推動上，聯盟緣何會有上述的無奈與無力感呢？其實，最後呈現在媒體上的訊息是什麼，正與聯盟的傳媒工作有關。

聯盟的傳媒小組早在2005年2月的國際策略會議結束後已開始工作。起初的部署，包括成立主流傳媒及另類媒體的資料庫，編織發放消息的網絡，爭取傳媒的報道和特寫。在開始階段，傳媒小組有五、六位來自不同成員組織的代表參與電郵討論，但實際操作則僅有三位成員：聯盟全職統籌區美寶、職工盟成員林英卿及亞

洲學生協會成員Rey Asis。區美寶事後檢討，指出聯盟在國際策略會議舉行時與傳媒聯繫緊密，但在介紹海外抗議團體的背景和行動時，卻因為恐怕影響來港人士入境而沒有大作宣傳。

聯盟是2004年9月才成立的。作為一個新成立的組織，首要的目標是爭取曝光和發言的地位。2005年4月，聯盟有成員參加了灣仔區議會的會議，發現傳媒將MC6新聞定性為保安新聞，所有記者都是採訪保安新聞的記者，才開始明白傳媒作了這種部署。於是聯盟決定把握時機，讓傳媒知道聯盟的存在，務求傳媒在報道任何有關MC6的新聞時，也會想起甚至採訪聯盟。

聯盟與傳媒接觸後，發現傳媒對MC6中關於農產品補貼等議題並不關心。聯盟邀請傳媒派員採訪公眾教育活動，記者也缺乏興趣。傳媒即使對於抗議者充滿興趣，但也只是因為期待戲劇性的事件發生。至此，聯盟明白到，期望傳媒主動報道MC6談判的消息與進程，並不樂觀。因此，聯盟不再迴避有關海外示威者的提問，並因勢利導將他們不得以而進行抗議的背景努力地向傳媒作解釋，吸引記者來採訪。雖然這樣做並沒有幫助扭轉傳媒報道的角度，卻使聯盟與傳媒的聯繫更加有效。傳媒開始視聯盟為提供有關MC6訊息的重要機構，而有些媒體亦逐漸派員採訪聯盟的活動。例如《明報》、《蘋果日報》、無線電視、有線電視、香港電台及來自西班牙、澳洲等地的海外媒體，都主動採訪聯盟。聯盟逐漸擴闊了傳媒網絡，並在媒體採訪報道期間觀察個別媒體與記者的表現，與報道公正和友好的傳媒更緊密地聯繫。

聯盟舉行了數次解說世貿會議的宣傳活動，由聯盟的成員團體解釋會議的內容。另外，聯盟亦有與國際抗議世貿活動接軌的活動，如紀念在墨西哥坎昆的抗議行動中自殺的韓國農民李京海的燭光晚會，在銅鑼灣街頭舉行的展覽與遊行等。除了作為公眾教育的項目之外，聯盟亦準備了有聲有色的道具和表演活動，藉以吸引傳媒的報道。這樣做比較容易使活動成為話題，目的是把世貿這件遙不可及的國際官商勾結生意經，從聯繫民眾的角度，將世貿政策對基層人民的影響告知香港市民。否則，抽空地談，人們只會認定抗議活動將會演成一場混戰，警方要嚴陣以待。可惜的是，記者甚少出席聯盟的解說環節，大部份報道仍然是以當天的活動為主，而對活動背後的議題則略去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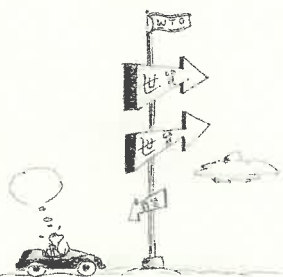


不過，個別傳媒也有較具分析性的新聞節目，可見聯盟的傳媒小組的工作沒有白費。這些節目包括無線電視的《星期二檔案》及《蘋果日報》的一系列專輯。傳媒小組一直與傳媒保持聯絡，有合適的故事就向傳媒通個訊息。隨着世貿會議逐漸臨近，一份對抗議運動不偏頗的報道有可能扭轉運動的局面。

有些傳媒簡介會早在 2005 年 7、8 月份舉行，但傳媒認為太早了，記者根本尚未開始準備，而日常採訪工作亦不容許記者們有額外時間深入探討世貿的議題。傳媒只關心有什麼「新料」。正因如此，許多主流傳媒的記者的理解和報道都顯得平面。例如，傳媒小組講過無數次，韓國示威者並非只是農民，也有工人團體等，但傳媒報道總是稱他們為「韓農」。傳媒報道對很多題目完全忽略不提，整個事件好像沒有背景似的，只知道抗議行動「好勁揪」。這都是因為香港傳媒只慣於做「即食」新聞，放過了立體深入探討的機會。聯盟因應傳媒的慣性，常要想出一些噱頭來吸引記者。這些噱頭，如 2005 年 9 月舉辦的燭光晚會，固然吸引到記者去採訪，但卻未必能抵償誣衊抗議人士為暴徒的傷害性報道。

2005 年 10 月，世貿總幹事拉米訪港，出席與非政府組織的圓桌會議。事前，聯盟本與政府的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商議好，會後出來接收示威者的請願信，但會後曾俊華並無實踐承諾。示威者一時激動，圍堵了與會者的汽車，要求他們出來接收請願信。此一情景迅即成為傳媒的焦點，剛好符合媒體對示威者的「激烈」、「暴戾」的印象。聯盟當天馬上檢討，然後達成共識，立即發表聲明，解釋此事導因是政府官員不守承諾，並指出「曾俊華出爾反爾」，才算是將之前的負面報道平衡過來。

此前的 7 月，傳媒小組建議代表聯盟發言的人，例如鄧燕娥、區龍宇等幾位主要成員，在向傳媒發言之前最好先彼此得到共識，以防在傳媒逼迫之下因情緒激動而失言。例如被問及海外示威者的人數時，其中一個說三千，但另一個又說五千，這樣就是口徑不統一，讓記者有做文章的空隙。於是聯盟在 10 月時經過內部訓練後，先就事件達成共識才發言。拉米訪港的小風波則是一次實況演練。





韓農以三步一叩的方式抗議世貿殘害農民（2005年12月15日）

到了2005年11月，許多報道說警方已將灣仔一帶的街道的地磚用膠水緊緊黏好，而且世貿會議期間會收起那一帶的垃圾筒。報道又說，當局已騰空監獄，有備而戰。聯盟向警方投訴多次，要求政府不要再發放這些對抗議團體很不公平的消息，但卻沒辦法讓傳媒明白，聯盟及其盟友一開始便承諾以非暴力示威為原則。許多媒體只抱着獵奇的心態，不斷追問抗議者有何計劃，甚至以「幾千韓農『殺』入灣仔」等字眼為標題，或以斷章取義的手法作報道。在這時候，無線電視的《星期二檔案》正好「出街」，許多人被這個節目感動了。

鑑於香港媒體並不熟悉世貿的議題，聯盟還與香港記者協會合辦訓練工作坊，解釋世貿條款及國際形勢，希望記協動員記者參加工作坊，在世貿會議舉行時能更好地作出報道。此外，香港大學傳媒研究中心也辦了國際視像電話會議，請了區美寶去作講解。在記協的工作坊上，政府代表力言已盡力在世貿談判上爭取對香港有



另類媒體拍得警察胡亂向群眾射水炮的情景  
(2005年12月17日)

利的條款。他的發言佔了大部份時間，留給非政府團體講話的時間所餘無幾。政府代表也沒有仔細解釋香港因何簽訂某些條款。

11月24日，聯盟與無國界醫生、樂施會及綠色和平等幾個非政府組織聯合舉行記者簡介會，再提及世貿對香港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

隨着越來越多海外團體到港，聯盟的傳媒工作進入了非常時期。12月初，海外團體陸續抵港，聯盟隨即給他們派發本地及海外媒體的記者名錄，並向這些團體解釋本地媒體的特色，讓示威者在有需要時直接與記者聯絡。同時，聯盟又安排各大國際聯盟及幾個國家的全國聯盟會見記者，介紹他們的活動詳情，並將各抗議團體的名單及聯絡方法交與傳媒。聯盟在記者會上宣佈開設兩條傳媒電話熱線，協助解答記者的查詢，又將民間活動週的活動內容上載到互聯網上去。

12月中是抗議世貿的民間活動週，聯盟除了在主要活動基地維多利亞公園設立了一個臨時傳媒中心外，還把位於灣仔的辦公室借予本地及南韓、台灣、美國等地的另類媒體，提供互聯網等服務以作現場報道。

由於聯盟要處理許多傳媒查詢，因為人手緊絀而疲於應付。有些查詢其實無關宏旨，例如維多利亞公園的場地批用因為涉及保險問題而遲遲未能落實，但許多傳媒卻抓着此事來提問，聯盟要一一作答。





聯盟聯同國際團體代表召開記者招待會  
(2005年12月)

**世貿受害者：一個都不能多！**  
燭光紀念晚會

我們呼籲各界人士，在九月十日（星期六）晚上七時至八時三十分，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支旗桿，舉行「世貿受害者：一個都不能多！」燭光紀念晚會。屆時將有樂隊演奏、詩歌朗誦、歌曲演唱等節目。屆時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共同表達對世貿會議的抗議，並為受害者發聲。

日期：2005年9月10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時至8時30分  
地點：尖沙咀天星碼頭支旗桿  
內容：展覽、燭光悼念、詩歌朗誦、歌曲演唱  
查詢：3173 8412 區美寶

「世貿受害者：一個都不能多！」  
燭光晚會海報

的行動已得到部份市民的支持。正是有了這樣的民意作基礎，傳媒後來才有較平衡的報道，沒有將示威純粹作為暴行新聞處理。

然而，關於世貿會議場內的新聞卻一直不多。主流傳媒如是，另類媒體如民間的網上電台、獨立媒體網站亦然。12月，世貿會議期間，部份主流媒體的報道偏重示威者的行動，只是追逐衝突的場面，捨棄會場內的談判進程。社會上有不少評論，指主流媒體的報道無助市民了解世貿議題以及為何會有抗議示威。與此同時，另類媒體對於 MC6 談判議題的報道亦不多見。區美寶指出，聯盟不能要求另類媒體一下子變得對世貿議題有高遠的識見，但他們在平衡主流媒體方面有實際的作用。香港目前的主流傳媒視野實在太窄，能有不同的媒體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就同一件事提供不同的報道，實在是太重要了。另類媒體的報道，對於聯盟及亞洲人權委員會後來撰寫香港警方在會議期間侵犯人權的報告，尤其有用。

區美寶提到，海外的另類媒體除了以非主流視角作報道之外，甚至還會成為抗

議全球一體化的其中一份子，又或者與其他基層組織緊密合作，一起去抨擊世貿及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不公義。香港的另類媒體，在這次抗議世貿的行動上較為傾向維持自己是正在本土發展的公民運動。至於立場方面，另類媒體可能基本上都同意世貿對基層的生計帶來負面影響，應該予以抗衡，但卻甚少將世貿對香港的影響作整體的連結和有力地表達。雖然他們大部份對於直接受到世貿影響的人表示關注，但卻未必會認為這是香港社會的一場運動。另類媒體的報道未夠深入很是正常的事。畢竟對於另類媒體、本土社會運動以至全港市民來說，這是第一次體驗世貿這類極具爭議性的國際議題。對比之下，海外的另類媒體對世貿會議的內容，其關注明顯高於本地的另類媒體，也許這是因為外地的另類媒體能夠較直接地感受世貿談判對於民生的影響。

本地另類媒體沒有將民生問題放入報道內容中，這一點與本地爭取民主的運動鮮有提及民生問題非常相似。或許本地的另類媒體與本地民運亦同樣處於發展的階段。聯盟仍然很需要與另類媒體保持連結，甚至發展自己的媒體部門，以推動運動的發展。至於主流媒體，區美寶仍然對之樂觀，並相信傳媒會調節過來。除非受到高壓控制，所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都被政權所封殺，否則媒體一定會有可能改變。主流傳媒的改變，依靠的是公民社會的發展。讀者、觀眾及聽眾應得到更多層面的新聞分析，而傳媒機構也不應凡事只為營利。

總結經驗，聯盟認為本身的溝通技巧還要再作提升。要得到傳媒的注意很不容易。聯盟總希望盡量爭取版位及避免負面新聞。然而，知易行難，因為聯盟往往太着眼於把世貿談判所有的前因後果全部擺出來，而有些民間團體的代表又甚少接觸傳媒，一下子難以對觀眾、聽眾及讀者作整體的考量和處理。例如，有代表曾被問及：「有學者認為世貿政策及私營化可以鼓勵競爭，提升效率，那不是好事嗎？」代表聽到便馬上動氣，表現激動。有時，民間團體可能真的需要「政治形象醫生」。除了專注行動策劃外，可能良好的溝通技巧也有助議題得到他人的支持。而且面對事情出現變數，特別是傳媒工作，先要冷靜，處變不驚，才可以尋求解決辦法，難題才會迎刃而解。聯盟應考慮成立自己的專責媒體部門，這會更有助於改善將來的傳媒工作。



## 漫長的爭取釋放運動



韓國國會議員特地來港聲援被控的示威者及會見港府保安局官員（2006年1月8日）

大概連2005年12月17日抗議行動的持牌團體亞洲外移勞工中心(Asia Migrants Centre, 簡稱AMC), 主要的組織團體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及韓國全國農民會總聯盟(Korean Peasants League, 簡稱全農聯)都意想不到, 一次抗議行動竟然會演變成漫長的法律訴訟和爭取釋放運動。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在抗議行動之前了解到農民的遊行路線, 應其要求提供各項協助, 包括帶頭的車輛、糾察及救護人員等。當事情發展到可能出現大規模拘捕時, 聯盟的一系列緊急應變措施就啟動了。所謂的「緊急應變措施」其實很粗糙, 它能夠應付當時的情況, 全賴工作人員在臨危受命下對自己崗位的熟悉與堅持。

聯盟在灣仔有兩個重要的據點: 一個是暫借街坊工友服務處的教育中心所做的辦公室, 那裡有基本的通訊及文書設備, 免費供本港及韓國的另類媒體作為製作和廣播中心; 另一個是香港職工會聯盟的灣仔再培訓中心, 於行動當晚是臨時辦公室, 讓大量被警方拒絕進入告士打道協助的聯盟工作人員及義工用來做統籌及支援工作。在職工盟這邊, 聯盟面對當時紛亂及複雜的資訊, 既要從速回應傳媒, 還要計劃翌日的閉幕遊行。工作人員徹夜不休, 不斷聯絡不同的本地及國際網絡和團體, 務求在18日早上可以會面, 確定當日的遊行安排。而在街坊工友服務處那



邊，亦有數名義工不斷聯絡來港的各個海外團體，找尋當晚失去聯絡的人士及編訂名單，為他們可能被捕作準備。那地方同時用作通訊中心，讓參與團體可以了解聯盟的安排。

當時，警方的拘捕行動極為混亂。拘捕時間、人數、原因及羈押安排，並不清楚。據後來公佈，警方於凌晨時份在醫院、灣仔告士打道一帶及維多利亞公園等地陸續拘捕了超過一千人（其後有十四人因非法集會而被起訴）。

在聯盟正為應付傳媒及籌備閉幕遊行而忙過不停時，聯盟的義務法律顧問團亦開始了工作。律師奔走於不同的警署，在警方的留難中，為被捕人士爭取最基本的權利，包括會見律師。言語不通、囚倉惡劣的衛生環境、羞辱性的搜身、掌摑、保暖毛氈嚴重不足、飢餓、體力透支、不知身在何處……凡此種種，令被捕人士飽受煎熬，而律師則疲於奔命。在警署外，一些團體及有心人開始發起聲援行動或絕食，並提供物資和人手統籌行動。

其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觀塘法院及警署從來未有過那麼熱鬧。每次被捕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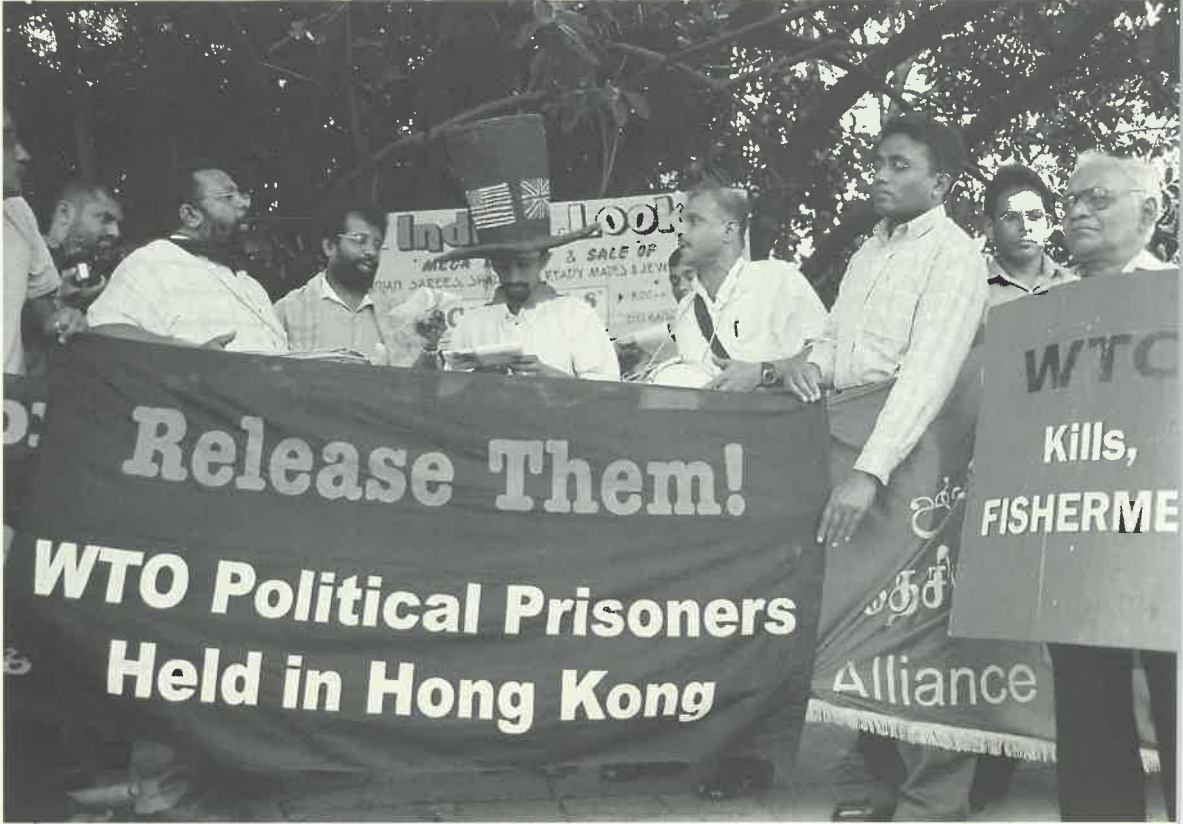


警察圍毆一名已倒地的台灣女示威者（2005年12月17日） 阿珊攝，獨立媒體提供

庭，都有大量的朋友到場支持。韓國農民繼續以苦行式的行動，如三千叩首及絕食，打動了香港人；聲援團體也不斷派員參與韓農的行動。在1月初，被控的示威者開始無限期絕食，支援團體展現出目標一致的團結氣氛。大家對警方無理鎮壓示威、濫用警權的行為，極其反感。被控的示威者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紮營，其所屬的團體全農聯及民主勞總也派員參與後勤工作。期間，本地支援團體每天都以不同方式替絕食的被控示威者打氣。演說、祈禱、唱歌、放短片，讓抗議世貿的聲音繼續下去。以往較少與主流群眾性團體合作的社運資源中心（俗稱「八樓」）及Simon's Family的表現最是令人難忘。「八樓」另類的介入模式雖然有時會讓組織者摸不着頭腦，但其表達卻有趣味盎然的時分，其堅持不屈的支持更是讓人動容。在遊行聲援之餘與被控示威者結下不解緣的七歲小小聲援人士Simon，更在示威者絕食抗爭期間不斷以行動表示支持。他一顆純真的童心，令那些身在異鄉面對審訊的示威者感到親切和溫暖。

在那段日子，香港普羅大眾並沒有被示威者激烈的行動嚇怕（其實市民在12月17日前已經常送物資到維園的營地）。聯盟不時收到市民的支持電話，提出幫忙

斯里蘭卡的團體聲援因抗議世貿而被政治拘控的示威者



聯盟與被捕示威者家屬到政府總部抗議，要求立即釋放（2005年12月29日）

被控的抗議世貿人士發起無限期絕食，期間香港團體每晚會舉行燭光晚會聲援（2006年1月5日）

一個氣球代表一家的意願（2006年1月5日）



被控的示威者。有人要來為他們祈禱，更多人是送食物來，捐錢的也不少。各方面的支持，令大家增添了不少信心，即使是個別之前反應冷淡的律師，這時候也比較願意站出來。

香港這次大規模的拘捕行動，在國際上亦引起極大的反對。這次的被捕人數比1999年西雅圖那次抗爭拘捕五百人還要多出一倍。世界各地都有人響應聯盟的呼籲，向中國領事館抗議。而在同樣有示威者被捕的韓國、台灣及日本，更有多次集會及遊行抗議。在1月10日及11日，由韓國的國會議員、日本及台灣的民間團體代表、國際自由勞聯、農民之路、國際食品勞聯等不同的國際代表組成的國際聲援團應邀來港，表達國際聯盟對抗爭的支持，並會見記者和立法會議員，也見過港府的保安局官員及律政司。

之後，被拘控的示威人士逐一被釋放。最後還剩下兩個韓農時，其中一個被釋放的示威者梁璟圭所屬的民主勞總適逢改選，新領導層屬重工業工會的會員，對世貿的批判意識較為薄弱，決定不再派人來香港協助翻譯。律師團為此很擔心，因為韓農不習慣和陌生人溝通，一直嚷着要回去，什麼罪名都願意承認，完全不利於法律上的抗爭。其後，民主勞總比較從大局着眼，認為認罪與否要視乎律師的策略和對民間團體的影響。要是民主勞總不再派人來擔當協調角色，官司恐怕很難處理。在整個審訊過程中，警方明顯歪曲事實，砌詞作供。律師很憤慨，希望被控的韓農堅持到底。

3月初再開審，律師團希望韓農不要輕言放棄。結果南韓那邊來了十多名支持



各式各樣的聲援抗議（2006年1月8日）

百多名港人絕食24小時，  
聲援被控的抗議世貿人士  
（2006年1月10日）

者，民主勞動黨的國際秘書親自來做翻譯。這一趟，韓農很合作，跟聯盟有商有量，又肯聆聽香港律師的分析。原來，來港示威的韓國團體回國後開了很多次檢討會，明白到國際團結的意思是不僅要人家支持你，也是透過彼此參與和支持去強化當地的抗爭運動。韓農態度改變，終於令港韓雙方立場一致。

接近開庭，控方律師提出了極具吸引力的方案：若其中一人肯認罪，則兩個人一同可以即時回國。辯方律師承認這個方案很有吸引力，想過接受，但細心分析，認為還是不應認罪，因為律師相信韓農勝訴的機會很大，建議官司繼續打下去。韓農再問：「是否必定勝訴？」律師答：「機會很大，即使輸了也可以上訴。」，還說：「如果上訴一定贏。」一方面，律師越來越有決心把這場官司打下去。另一方面，韓農也越來越理解這場官司的意義。

聽過審訊的內容後，所有人都知道警方其實是刻意針對韓國人。那晚在現場有上千人集會，警方最終拘控的只有海外的示威者，這明顯是選擇性施法。為了應付針對世貿會議的抗議活動，警方曾傳達了特別守則，但執法警員卻沒有依照守則辦事，甚至連認人手續也不依照慣常的做法。慣常的認人方式是從八個「戲子」中去



隨着最後一位被控示威者尹一權（左二）無罪釋放，抗爭正式劃上句號（2006年3月30日）

認一個疑犯，最拙劣是面對面一對一認人。但這次警方從一開始便選擇了後者，很難令人相信警方的做法公正。



官司終於勝訴，大家都覺得是代表正義的勝利。審訊磨人，難得的是留港的被控示威者因為和聯盟及本地團體相處久了，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雙方認識加深，韓國團體開始學習聯盟的國際視野。聯盟因為可以近距離和韓國的工運和農運團體接觸，也開闊了眼界。幾個月來同憂同喜，大家變成了盟友。

因為警方及港府在這次任意拘捕事件中涉及連串侵犯人權的行為，聯盟與亞洲人權委員會合作進行了一次調查，就香港警方在民間抗議世貿活動期間違反人權的事例，總結了一份報告，呈交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有關香港的聆訊會議。委員會其後建議港府應成立一個獨立的、具調查權力的機構，處理市民對與警權有關的投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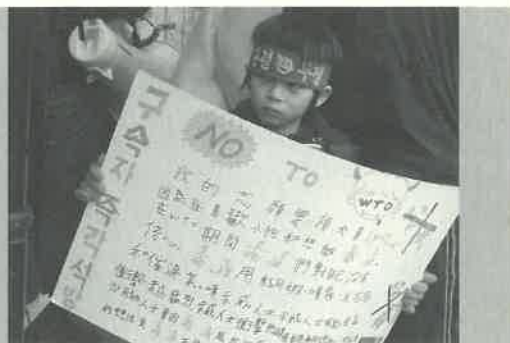
曾經來港抗議世貿的南韓團體十分重視這次經驗，稱之為「香港鬥爭」。為了好好總結這番寶貴的經驗，在2006年7月，韓國全農聯、民主勞總及民主勞動黨聯合邀請了香港的聯盟代表到南韓去交流，會議上大家非常肯定鬥爭的意義。南韓團體的總結是：言語不通阻礙了雙方溝通；場內談判和街頭鬥爭沒有適當的策略配合，也是鬥爭不順利的原因。南韓團體打算日後加強與亞洲民間團體的聯繫，展望一個正面的全球化運動。



比利時中國大使館外的抗議行動



菲律賓馬尼拉的抗議行動，聲援在港被捕的示威者



Simon 原來的志願是當警隊領犬員，但在世貿抗爭後已有改變（2006年1月8日）

韓籍女示威者（後排中間站立者）在記者會  
上控訴遭警察掌摑（2005年12月20日）



## 由抗議活動演成的政治官司 ——一個律師的回顧

一場街頭抗議活動，結果演成法律訴訟，完全是意料之外。在2005年11月底應邀做義務律師的大律師黃瑞紅，實在想不到抗議活動的最後一天才是她最忙碌的一天。

當初，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籌組義務律師團的時候，黃瑞紅只預計部份海外的與會者或會有入境問題，而義務律師的責任只是提供法律諮詢。即使如此，她能夠召集的律師也不足十個，因為「很多律師朋友對反世貿印象欠佳」。她丈夫是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成員之一，她擔當律師團召集人似乎很自然。雖然律師朋友的反應不算踴躍，但她心想：十個律師應該夠了！

這次世貿會議開始前一個星期，黃瑞紅接獲四五個電話，都是關於來港人士被拒入境的查詢。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法國農夫 Jose Bovi 的諮詢。Bovi 被扣留在機場的警察控制室，香港警方表示他是不受歡迎的人士，要求他原機返國。他不肯，打電話問律師的意見。黃瑞紅聽了電話之後，馬上替他申請反對遣返，又找了大律師潘熙和另一個律師 Mark Daly 和警方週旋。結果幾小時後，警方讓步。警方可能沒有估計到，聯盟的律師團反應會那麼快速和準備那麼充份。

入境時被扣留的也不盡是農民領袖，好些國家的普通來客也有被扣留問話四五小時的遭遇。來自印度、印尼、泰國、菲律賓及斯里蘭卡的團體代表都曾被扣留問話，有些長達七小時。警方並沒有解釋扣留的理由，而且幾位婦女團體的代表的手提袋更被警方搜查。

抗議世貿的隊伍陸續來到，黃瑞紅以為責任快要完成，誰知更大的麻煩還未出現。

### 十二月十七日，灣仔告士打道

那天，黃瑞紅參與了抗議世貿的遊行。她走在隊伍後面，幫忙做糾察。下午六時左右，她接到電話，知道韓國遠征團的總秘書處聯絡員Sohi被警察拘捕。警察拒絕透露拘留她的地方，Sohi估計自己身在灣仔某座大廈內。黃瑞紅質疑警察非法拘留，警方才說要帶Sohi到中環警署去。在趕往警署途中，黃瑞紅突然收到Sohi的電話，她被釋放了。

擾攘一輪，待黃瑞紅要歸隊時，只見警方不停封鎖灣仔各個路口，彷彿如臨大敵。她走在電車路旁，隱約嗅到催淚彈的氣味，心知大概出情況了。她於是索性跑回金鐘的辦公室去看電視新聞，準備隨時候命。

入夜，警方已經包圍在告士打道的示威人士。

### 十八日，全港多個警署

凌晨，黃瑞紅接到其中一個糾察的電話，知道警方在醫院進行拘捕行動，約四十人可能被送往觀塘警署。她馬上「飛的」去觀塘警署，路上還通知其他三個義務律師。

四位律師在警署內由一點等到三點，還未可以見到被捕人士。他們和負責的督察理論，督察以程序理由加以留難：「要見人，有冇名呀？」至三時許，警察才通知他們，被捕人士被關在對面觀塘法院的囚倉。

那裡全部是男性韓國人，都受了傷。他們看來很平靜，沒有嚷着要走，只是很



觀塘法院外的聲援抗議（2005年12月20日）

疲累，都躺在那裡。他們最主要是投訴囚倉的毛氈不足。其中一位被扣留人士描述：囚倉大約只有十二至十五平方米，關了三十一人，卻只有五張毛氈，他們還被迫脫去襪子。黃瑞紅發覺韓國人很怕冷，後來才知道韓國室內大部份有暖氣，而香港的囚倉冷冰冰，令他們很不習慣。

他們更加不習慣的是要被警方搜身，只脫剩內衣褲。被捕人士感到受侮辱，部份有強烈的反抗情緒，有兩三個甚至堅拒被搜身。在場的幾位律師盡力替他們爭取，用文化差異的說法試圖說服警察，效果還不太差。有一兩個警員覺得示威者並不是大壞蛋，因此網開一面。前線的警員看來頗有酌情權，被捕人士受到怎樣的對待，很視乎警察的個人素質。個別警察還頗有同情心。被捕人士喊肚餓，有警員把自己的餅乾貢獻出來。

然而，警方整體對待示威者還是很差勁，完全違反國際人權公約。好些受傷的示威者仍在醫院接受治療，便被警察抓到警署去。律師要馬上跟警方週旋，受傷者才能到醫院繼續接受治療。



示威人士一批又一批被抓進警署。至18日早上六七時，女囚倉已人滿，被捕者只能坐在地上。折騰了一晚，大家都疲憊不堪。有人暈倒，有人餓得要死，有人冷得直打哆嗦。律師要求警方提供食物，警方卻說未到早餐時間，無法供應食物。警方一切按章辦事，律師只能盡量和警察商量，替被捕人士爭取最基本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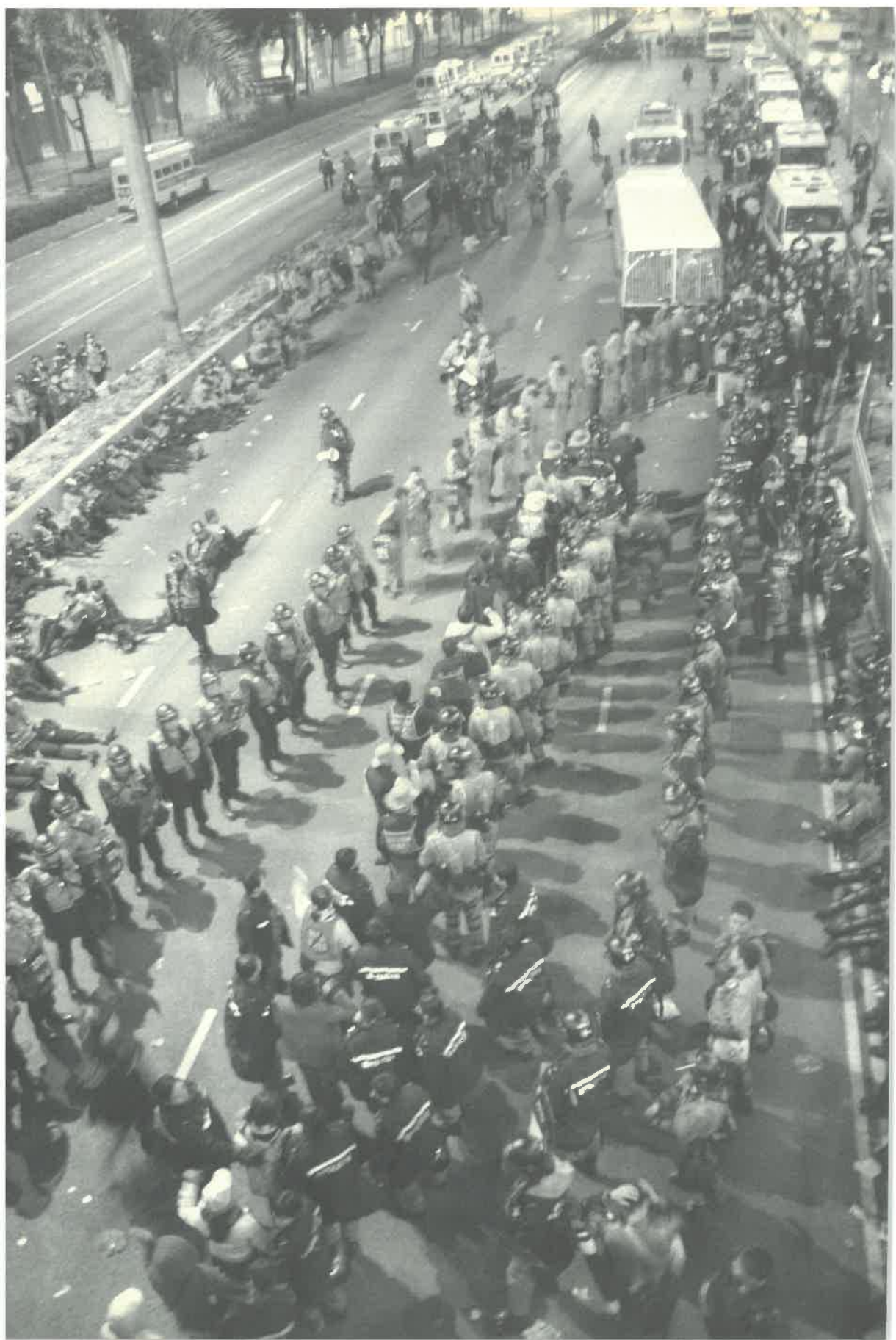
整整一晚，幾位律師不停在幾個囚倉之間來回奔走，處理投訴。有女被捕者投訴上警車時因反抗被警察掌摑；又有人手腕被膠帶索得太緊，陷入皮肉，要求鬆綁。種種事情看似細微，理應很容易處理，但總要由律師出面，警方才會稍稍改善。要不是有律師在場，警方一定不會理會被捕人士的要求。再者，一個總計拘禁了百多個示威者的囚倉，整晚居然只有一個翻譯。

處理了囚倉基本的問題後，黃瑞紅開始其他任務。那一天，她的手提電話、聯盟的熱線及她家中的電話，一直響過不停。超過一千多人被捕，究竟被抓到哪裡去了？她給師父沈士文大律師打了一個電話，再由沈負責聯繫更多律師，向警方高層遊說，以及到不同警署去探訪被捕人士。

那時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參與抗議世貿的團體都不知道自己的成員被抓到哪個警署去，只能要求保安局列出名單。結果得悉被捕人士分別被拘留在近二十間遍佈九龍和新界各處的警署和羈留中心。黃瑞紅的工作就是聯絡律師去探視。但因為人手不足，有些律師跑完這所警署又跑那所，好不吃力。最莫名其妙就是有一批人被抓到新屋嶺羈留中心去，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地方，最後才查出位於邊境禁區。律師趕到那裡去，警方又說要禁區紙，幾經爭持，律師才獲豁免。

即使得以進入警署，工作也不見得順利。個別警署刻意留難，要求律師提供被捕者的名字才批准接見。律師寫錯一個字，警察就說沒有這個人。比方秀茂坪警署，因被捕者國籍不同，律師也不確切知道誰是誰。律師在那兒耽擱了一整天也徒勞無功，一個人也見不着，結果花了很長時間糾纏，才獲准在被捕名單中選兩個人接見。可見警方完全漠視被捕人士有會見律師的權利。

被拘留人士本來可以打電話，可是這個權利也沒有被尊重。警察愛理不理，有些甚至阻止被捕者使用手提電話。又因為沒有足夠翻譯人員，好些被捕者根本不知



獲釋女示威者召開記者會，譴責警方在拘留期間的種種侵權行為（2005年12月19日）



道自己身在何方。一位加拿大籍示威者從拘留的地方打了電話出來，警察告訴他在上水，律師卻聯絡不上他，花了很多工夫才知道他原來在邊境的新屋嶺。由於被捕者的權利被嚴重侵犯，律師、聯盟和其他國際團體翌日便向保安局投訴。

四十八小時過去，警方不得不放人。第一批被釋放的是女性示威者。最後，十四個示威者被控告，晚上在觀塘法院開庭。代表律師想保釋，但不獲批准，原因是警方要認人。因為警署拘留中心的環境惡劣，律師要求把被拘控者轉到荔枝角羈留中心，但又被拒絕。被控的示威者無奈要在警署逗留三天。由於十四人被扣留在三個不同警署，律師和聯盟的負責人通宵跑了三所警署，給他們帶去個人必需品。跟被捕者傾談過後，律師知道他們很有憂慮。被捕者說，不明白為什麼拘留了那麼長時間還要被起訴，有點匪夷所思。因為他們在韓國，示威後被抓，頂多被警察打幾拳就放人，「哪有搞到打官司的？」律師花了很多唇舌解釋，被捕者還是不能理解。

被困異鄉，感覺並不好受。那十四人對律師很有期盼，希望每天都能見到律師。囚倉設施實在太差，內裡只有石床。雖然有廁所位，卻沒有沖廁

被拘捕的示威者自製廁所解決「急事」  
(2005年12月18日)



拘捕行動長達 17 小時。示威者  
中缺水缺糧，缺乏衛生設施，被  
禁 (2005 年 12 月 18 日)

律師、獲釋示威者和聲援人士合照（2006年3月30日）



設備。如廁完畢，要靠警員在外幫忙沖廁。警察不會殷勤處理，因此那角落常常發出異味，被人稱為「臭格」。又因為全港所有警署只給被捕人士提供冷水浴設施，被囚人士很有意見，律師們唯有盡力爭取。後來，警察知道他們申請開庭，要求轉移羈留地方，才連忙帶被囚人士去洗熱水浴。

總的來說，警署囚倉環境確實值得關注。有些警署外觀很先進，囚倉卻非常不堪入目。有一名前線警員悄悄向律師透露，他所駐守的警署內有五個內地人，因為時值嚴冬，而警署又沒熱水洗澡設備，所以那五個人足足有二十多天沒洗澡，情況令人側目。

事情發展至要上庭打官司，便要重新部署，要有一個強大的律師組合。黃瑞紅諮詢了師父的意見，師父提議找資深大律師李柱銘。黃瑞紅知道，李柱銘在理念方面和聯盟比較接近，就很安心的找他做代表，她和另外幾名律師潘熙、張耀良及關尚義做協助。這個組合對這場官司有共通的看法：被控告的十四人真的沒有做過什麼，大部份甚至不在現場，警方真的荒謬至極。

證據不足，警方理虧，有十一人無法辨認，不得不釋放。官司前期，律師團大部份時間是和警方議價。警方不服輸，硬要告下去。到了剩下三個被告，依然是不夠證據。律師團信心十足，說是從沒打過一場官司勝算這麼高。律師都覺得自己王牌在手，必勝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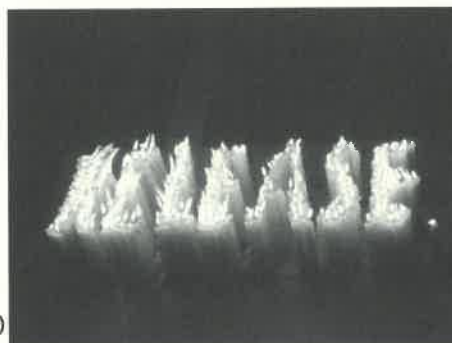
可是剩下來的三個被告卻歸心似箭，根本不想再拖下去。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最大的牽掛是家鄉的生計，因為該段時間在農田上做的工夫，很影響農作物的全年收成，而工會方面又有很重大的改選要進行。三個人為了盡早回國，甚至願意認罪。律師開給警方的條件是承認未經授權集會，但警方還是不接受。檢控官也和警方商談，但警方硬是要告到底。對於警方因為要挽回面子而堅持告到底，律師很氣憤。

談判拉倒，律師們覺得警方欺人太甚，大家都豁出去，覺得官司要繼續打。本來打算認罪的三個人重新答辯，不承認控罪。那一刻，大家都很興奮，心想這才是正確的道路。

結果三人之中，控方在中途撤消其中一人的起訴，一人表面證據不成立，一人罪名不成立無罪釋放，官司勝訴。

贏了漂亮的一仗，黃瑞紅很興奮。她說，不論在意義、道理、法律及證據各方面，被控的一方都處於高位，「所以這場官司一直打得很開心。」

這場官司帶來最大的滿足，在於堅定了抗爭的信念。在性質上，這是一場政治官司。律師在整個過程中的種種安排，都以堅守示威者抗爭的理念為原則：集會是天賦人權，世貿是一台不義的跨國機器。黃瑞紅認為，這場官司對律師來說也極有意義，法庭內有法律的爭持，法庭外有群眾的抗議，是很不錯的配合。



燭光晚會中燃點起釋放的希望（2005年12月22日）

# 差異與希望

——一個局中人看反世貿及國際運動的未來

譚駿賢

2005年12月，一場抗議世貿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運動，將香港、韓國以至亞洲及世界各地的民眾都捲了進來。

人數眾多的來港韓國農民，加上其花樣百出的示威形式，自然成了媒體及市民注目的焦點。

作為運動中的推動者之一，參與了由籌備到行動到爭取釋放的整個過程，我相信我在其中所觀察及接觸到的人和事，比媒體報道和分析所投射出來的印象，能帶來不同的認知及了解。尤其是人們總以為反世貿就是韓國農民的抗議時，更有需要告訴人們運動的深層面貌及背後的種種含義。

## 1. 韓農≠反世貿……的全部

早於2005年年中，已有消息說，有多達數千名韓國人會到香港參與12月抗議世貿的行動，最多人來自韓國的民主勞總 (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其次是農民組織及其他社運及學生團體。其後，由於民主勞總出現內部問題，最後只派出二百多人到港，而千二名韓國農民自然成為最人多勢眾的一群。

儘管如此，韓國「遠征鬥爭團」的人數確是眾多外國參與者之中最龐大的。但若就此簡單地將這場反世貿抗爭說成是韓農的抗議，則明顯是有失偏頗，不盡不實。

事實上，單單韓國團體內部，就有工會、農民、學生以及關注全球公義等組織。而其他東南亞國家中，除農民組織外，亦有漁民權益組織，關注免除窮國債務的團體，婦女組織、學生組織及其他勞工團體。香港方面，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成

全球聯陣派代表到韓國參與交流及檢討，期間參與遊行，聲援反對美軍基地擴充的韓國農民（2006年7月22日）



員中，除了工會外，亦有來自宗教、婦女等組織，但當中最不容忽視的是動員能力驚人的外傭團體。當然，來自歐美的關注世貿的組織都派員到香港來，國際自由勞聯所動員的人數較以往任何一次世貿部長級會議都要多。不過，單以人數計，他們只是運動的少數，影響力也不能與1999年西雅圖的抗議相比。

韓國鬥爭團由於人數眾多，加上奪目的抗爭方式如三步一叩、集體跳海、火燒棺木，還有12月17日晚直接挑戰警方向會場進逼的行動，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的訴求，自然引起傳媒以至公眾的關注。

因此，我相信隨意街上找個港人，問他對那場反世貿抗議的印象，得出的答案不是韓農抗議很激烈，就是世貿剝削農民！故此，除了農民（特別是韓農）的處境在香港會議中得到重視外，其他由世貿帶來的問題，如《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帶來的公營事業私有化，《非農產品市場准入》對漁民、林業工人、環境的影響，以至《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議》對生物多樣化及藥品專利的影響，都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筆者不嫌冗贅，要申明這次反世貿運動參與者的多樣性，並不是因為運動被韓農「騎劫」了而不值。相反，我想藉此提醒人們，一場真正的運動是由眾多力量組

構而成的，雖然當中有主導的，有邊緣的，但並不彼此孤立，互不相干。

## 2. 韓港差異

在本書各篇章的論述中，談論得最多的就是跟韓國參與者的關係。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席鄧燕娥多次述及韓國團體如何在決定所有行動後才知會她。義務律師黃瑞紅亦提到在訴訟過程中因種種政治文化上的差異而做成的誤解與疑慮。有些時候，韓國團體那特立獨行的作風幾弄至其他國家的參與者公開表示不滿。

老實說，2005年12月行動中的種種不協調，幾乎是無可避免的。首先，行動形式的差異早已擺在前頭，不易磨合。1999年西雅圖的抗議世貿行動，強調的是所謂「非中心」、「去權威」、「沒有領導」的所謂新世紀「沒有答案」(non-answers)的抗爭。這與韓國人重視紀律、服從領導及跟從組織指示的行動形式，簡直是天淵之別。

韓國人這種鬥爭形式，是注定不會受到美歐那些自由派、無政府及後現代派的反全球化評論家歡迎的。民主勞總代表團領袖梁璟圭也指出，韓國人這種行動手法，與韓國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及過去數十年的威權統治有關。

香港如韓國一樣，曾是殖民地，曾被西方強權的「槍炮與戰艦」所踐踏。今天，壓迫以新的形式出現。官僚與跨國企業互相勾結，以所謂「自由市場」之名，掠奪他國資源，榨取經濟利益。面對這樣的境況，我們回應的手法是應當緊貼西方國家的非組織化方式，還是從本地以至地區的共同歷史經驗出發，來建構出以地域為基礎的行動形式及反抗的訴求呢？

據我觀察，過去幾年，香港社會運動圈子內，有個別團體企圖實驗一套幾近於「非中心」、「去權威」、「沒有領導」的行動模式，目的是挑戰一切權威與組織。參與者除了挑戰大權力（如政府、財團及警察等），也質疑一切微觀權力（包括政黨、工會以至行動者本身），結果每次行動幾乎都是吵吵鬧鬧收場，但宏觀權力的擁有者卻絲毫沒受影響——政府權力不斷膨脹，但責任卻不斷縮少；財團越賺越多，「市場」卻越來越自由……



這種使人沮喪的結果，我想與反抗運動的積貧積弱、互相疑懼及彼此不信任有關。回頭看反世貿的韓國人，他們團體之間並不總是一致的，甚至也有矛盾，但卻能在行動時顯示出團結的一面，也表現了群眾的力量。我相信這種力量是當權者所懼怕的。反觀香港，若團體、政黨及各社會積極份子未能從中學習，繼續不屑合作互補，恐怕最後得益的還是權力集團。

### 3. 國際主義

自西雅圖大示威後，有人預言新一波的國際主義運動勢將復興。事實上，近年各種反對世貿、世銀、國際貨幣基金會及八國集團(G8)的抗爭活動確有日漸趨向跨國之勢。

本來，處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年代，跨國聯合抗爭這種另類全球化也是理所當然的趨勢。然而難題在於，我們已就這種跨國抗爭做好準備了嗎？不是說各國民間團體、工會不曾有過國際交流合作的經驗，而是過往那種「說了算」的國際主義(lip-service internationalism)——如出席國際會議，發表像政府施政報告般的文牘及呼喊調子高得不可再高的口號——是足夠的嗎？

早於三十年前，活躍於反核運動的英國左翼歷史學家湯普遜 (E.P.Thompson)就指出：「……如果我們只是沉默的聽眾，我們不是在進行真正的對話。國際主義不應像電視台向異域 (alien lands) 播放全國性節目般，而應該是匯聚、交流。」既諷刺而又無奈的是，湯普遜還未等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年代來臨便已作古了，但他那段話至今仍然有效。

也不是說國際主義抗爭這麼多年以來毫無寸進。事實上，自西雅圖反世貿大示威以來，各式各樣的跨國網絡都先後建立起來，以便協調世界各地的反新自由主義抗爭運動。像OWINFS (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這樣的組織網絡，在聯繫會場內外反擊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行動中，也扮演積極的角色。

然而，縱觀整個西方世界，由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 / 反新自由主義)組織內部，到標榜全球行動的網上獨立媒體，以至主流傳媒如



韓國民主勞總領隊指揮示威者向封鎖線進逼的行動（2005年12月13日）



《紐約時報》、CNN（有線電視網絡）、BBC（英國廣播公司）等，上千人被捕的香港抗議世貿示威，只不過佔去了可有可無的一小角報道，與發生在西雅圖、熱那亞、愛丁堡等地的抗議世貿、抗議八國集團的報道篇幅根本不可比擬。無怪乎鄧燕娥在意大利出席左派大會後慨嘆：「發達國家有家長心態，只想知道第三世界國家的慘況，表示同情，但對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和意見……卻不願意細心聆聽……」

無容置疑，來自地球板塊不同角落的不同國家的不同組織，在反全球化的大旗下，各種政治立場、抗衡策略、聯盟光譜以至鬥爭手段也是千差萬別、充滿差異

的。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就是以美歐為基地的跨國網絡，其主導性的「反全球化」話語仍是擺脫不了美歐中心主義的。

若要從宏觀層次總結2005年12月抗議世貿 / 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抗爭經驗，我認為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嘗試跳出美歐中心的國際主義，並建立以亞洲歷史經驗為基礎的地域性國際主義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

這種亞洲區國際主義的嘗試，應由百年前同被歐美國家殖民，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工業起飛，並且同樣經歷由美英支持下的威權獨裁政權過渡到民主政治的發展，及至九十年代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又有新自由主義介入區域發展等共同經驗建構起來。

2005年12月亞洲區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在香港的聚合，就是這種區域性的差異與共同性的具體反映。韓式鬥爭形式及組織形態，使香港的參與者既欣賞又難以適從。這種認知上的矛盾，反映於本書中提及的所有人物。但設身處地，我想韓國人最初也難以明白，為什麼香港人會那樣看重法律規制。

筆者2005年11月到南韓釜山參與抗議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示威時，順道與將會到香港參與抗議世貿的主要組織者召開策略會議。當討論到正與港警磋商遊行路線及示威地點等安排時，他們那種不耐煩是溢於言表的。原因是，在南韓，他們的示威行動是從來不會與警察商量的，因為警方從來不批准他們遊行示威。故此，他們每次抗爭都是打架收場。而南韓警察的暴戾，更令他們深信全世界的警察都是這樣的。因此，在港的抗議世貿行動即使荒謬地有上千人被捕，但他們對港警的結論竟是：「香港的警察都很善良！」

聯盟的義務律師黃瑞紅在接受訪問時，也表達了與韓國人彼此在處理法律問題上的種種分歧。被捕韓人不明白為什麼香港的法律這麼繁複，最初亦不相信官司打下去是會贏的。他們在韓國示威被捕後，通常是在警署內被警察打一頓就放人！故此，他們會見辯護律師時，第一件事不是討論案情，而是叫律師轉告，可否給打一頓後就盡快回國。

筆者點出港韓兩地的差異，無非是要重申：在建構以區域為基礎的反對新自由



主義的國際行動時，彼此認識、諒解及尊重本地與外地的差異，是建立鬥爭共同基礎的基石。特別是在當下新自由主義及反新自由主義的主導權力及話語都是以美歐為中心的時空中，我們要創造歷史，也只會且繼續會在既有的歷史條件及限制之下創造。

#### 4. 運動的希望

自2005年12月抗議世貿那次帶點倉促拼湊的合作抗爭後，各方面都意識到，日後的區域性合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尋求更為理想的合作共識及基礎。例如，國際公共服務聯會韓國總部（Public Service International - Korean Council）本來打算在2006年12月於當地舉辦亞洲區公共服務工會策略及發展會議，但適逢聯盟於同一時間在香港舉辦「香港社會論壇」，針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教育及行動。結果，韓國工會得悉後，主動提議將工會大會改於香港進行，並配合社會論壇的主題及出席遊行抗爭。我想，若沒有2005年12月所發生的一切，這種合作共識也不會於今天輕易達成。

不過，要真正推動亞洲區域性的抵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我認為還有很多問題要處理及釐清，包括不同組織之間在政治經濟理念上的認知與分歧，組織形態及差距，對區域及國際形勢的評估，運動的具體目標，短中長期的抗爭策略及運動的包容性（向誰及不向誰開放），等等。故此，若要進一步加強區域組織間的合作，必須對下列的具體問題作出深入的交流及找出具體的處理辦法，包括：

- 如何加強組織層面間的橫向合作基礎，包括組織成員的合作及交流途徑？
- 如何增進及交換對新自由主義在各自地區中實踐的理解及認識？
- 如何理解亞洲區被殖民的歷史，特別是對日本及美國的政治立場？
- 如何理解中國政權的性質及發展方向？
- 如何看待當下政治經濟格局中工人農民及被壓迫者的階級聯合鬥爭的前景？
- 怎樣加強彼此對鬥爭目標的方向，特別是在建立一種非新自由主義 / 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模式的訴求及目標？

上述這些問題，絕不是可以輕易解答及找到共識的。只有通過不斷的合作及交流，在這個過程中去探索、制訂及修正，才有機會整理及訂出討論的議程。

## 5. 香港反世貿：終結的開始

以上種種討論，既是個人參與2005年12月反世貿抗爭的思想札記，也是看過本書其他文章後，大膽地作出的一點總結。同時，本文亦是2006年7月韓國之行，再見到一班曾經共同抗爭的韓國朋友後的一點感想。

筆者自知文中述及的分析、批評及建議仍很不成熟及不足。在能力及篇幅條件所限下，筆者只能探索性地提出一些觀點，使在香港進行的抗爭運動，可以繼續透過批評及討論延續下去，不至於像過去一次又一次的運動般轉瞬即逝，白白浪費了積累思想及行動資源的大好良機。

上文探討亞洲區抵抗新自由主義運動的合作前景，明顯地將討論重點置放於南韓與香港的脈絡中，並沒有觸及如何推動與中國國內的工農合作，或加強與反資、反殖、反帝的日本左翼組織的聯繫，或增加與分佈於亞洲各國的菲律賓、印尼外僑組織的結盟，等等。這些都反映了本文的缺陷。然而，我深信本文討論的方向是正確的，尤其是在觀察過亞洲地區最近一連串的事態發展以後。

2005年12月抗議世貿的行動早已完結，世貿談足五年的多哈回合也宣告「玩完」了。但抵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卻未完結，在亞洲更只算是剛剛起步。在香港，經過抗議世貿一役後，民間監察世貿聯盟與全球聯陣合併，轉型成一個新的團體「監察全球化聯陣」，繼續在港推動批判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基層運動。以亞洲各國人民為主體形成抵抗世貿的鬥爭，燃起了區域性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希望之火。我相信這個火種在2005年燃點之後，將會不息地燃點下去。

OWINFS 參與香港的  
抗議世貿行動  
(2005年12月11日)



## 附件一：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組成及架構

世界貿易組織曾許諾自由貿易會為全球帶來經濟增長，但目下所見卻是全球經濟更不穩定，出現金融危機和衰退、失業和就業不足，全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闊，環境污染持續惡化……

因此，2005年在香港舉行的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一如以往所有世貿會議一樣，受到各國民間團體的關注。香港多個民間團體於2004年9月22日成立了「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要工作包括：

1. 聯繫本地工會組織及民間團體的力量，商定對世貿的共同議題及立場；
2. 推動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提高社會人士對世貿的關注及了解；
3. 為針對世貿部長級會議的相關民間活動及預備工作籌募經費；
4. 統籌及協調世貿部長級會議在港舉行期間由民間發起的研討及抗爭活動；
5. 負責聯繫及協調國際間的關注團體；
6. 倡議改善香港政府不民主及不透明的世貿決策政策。

**聯盟成員**（筆劃序，原名為外文則按字母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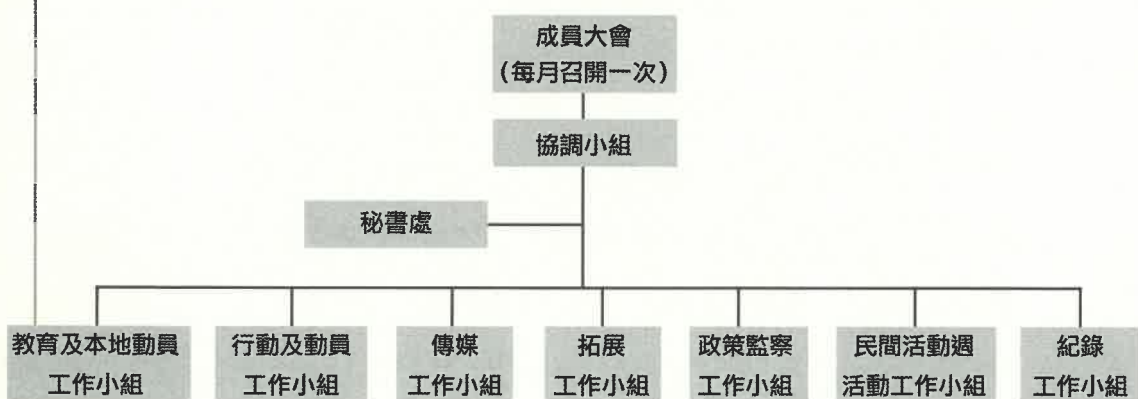
-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
- 全球化監察
- 全球聯陣——勞工基層大聯盟
- 先驅社

-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
- 食物環境衛生署管工職系工會
- 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 香港基督徒學會
- 香港郵政局員工會
- 香港職工會聯盟
- 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
- 建築地盤總工會
- 第一標準薪級員工總會
- 消費者力量
- 街坊工友服務處
- 紫藤
- Asia Migrants Centre (AMC) 亞洲外移勞工中心
-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 亞洲移民人士聯盟
- 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 (APMM) 亞洲外移勞工陣線
- 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 (ARENA) 新出路亞洲區域交流
- Asian Student Association (ASA) 亞洲學生協會
-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Urban Rural Mission (CCA-URM) 亞洲基督徒會議



- Coalition for Migrants Right (CMR) 外移勞工權利聯盟
- Documentation for Action Groups in Asia (DAGA) 亞洲行動組織紀錄
- Far East Oversea Nepalese Association-Hong Kong (FEONA-HK)  
遠東海外尼泊爾人協會
- Filipinos Domestic Helpers General Union (FDHGU) 菲律賓家務助理總工會
- Indonesian Migrants Workers Union (IMWU) 印尼外傭工會
- The Hong Kong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Organization (KOTKIHO)  
香港印尼外移勞工組織
- Shambhala Foundation 香巴拉基金會
-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 (UNIFIL-HK) 香港菲律賓人聯盟

###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架構圖





## 附件二：就舉辦「抗議世貿！——民間活動週」的立場

###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

2004年9月22日通過

#### 1. 目標

- 1.1. 使世貿無法就進一步擴大投資及貿易自由達成協議。
- 1.2. 藉此推動本地的反私有化、反外判化的運動。
- 1.3. 向港府施壓，改變其在世貿談判上一貫的黑箱作業。
- 1.4. 藉此提高本地民間團體及基層市民對世貿及所謂自由貿易的本質的認識，提高本地社運對全球經濟權力分配的不公的認識。
- 1.5. 喚起中外關注中國入世後勞動人民的處境。
- 1.6. 促進國際間勞動人民和民間社會的交流、合作和團結。

#### 2. 基本立場

- 2.1. 當世貿在1995年成立時，各發達國政府許下諾言，謂貿易自由化將會為各國帶來更多的經濟增長，從而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及減少貧窮。九年已經過去了，但世貿所能交出的成績單，只能是這樣一幅圖像：全球經濟更不穩定；接着是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的衰退；即使後來各國有不同程度的復甦，可是就業機會及待遇往往沒有相應的、足夠的增長。全球貧富懸殊和環境污染持續惡化。
- 2.2. 雖然香港一向都是自由港，資本和商品一直自由進出，但世貿組織所推動的自由化一樣對香港的就業水平和貧窮問題產生消極影響。香港政府在黑箱作業下帶頭簽訂了世貿許多協定，都是直接或間接打破香港原有的公營部門和對市場

的種種監管，鼓勵香港政府不斷進行私有化、外判化、撤銷市場管制等等，因而加劇了惡性競爭和財團壟斷的傾向，令香港貧富懸殊有增無減。

2.3. 世貿所有協議的最高原則是自由貿易，並且把一切關乎勞工、農民、婦女、青年、弱勢社群、食物安全、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市場規管都往往視為貿易障礙，都要除之而後快。1996年世貿部長級會議的聲明也說：「反對使用勞工標準來達到保護主義的目的。我們同意，各國的比較優勢，特別是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無論如何是不能質疑的。」遵行這一原則的結果是讓跨國公司更自由地、不斷地從高工資地區轉移到低工資地區，使各國勞動人民的待遇陷入全球比賤的深淵。我們重申：人民的就業權利和獲得生活必需品的生存權利，凌駕於所謂自由貿易或任何商業考慮。因此，至少要做到：所有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國際環境保護公約等等所載的基本原則，要凌駕於世貿協議，而不是相反。

2.4. 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將於明年在香港舉行，繼續2001年的多哈議程以及2004年7月的日內瓦總理事會會議的議程，打算在非常廣泛的範圍達成協議，包括農業、工業、服務業、知識產權、政府採購、貿易便利化等等，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擴大跨國公司跨境投資和買賣的自由。對此，我們表示反對並樂見其達不成協議。

2.5. 按照《服務業貿易總協定》的原有範圍，許多從前是或一直是公營為主的公共建設和服務，從食水、郵政、醫療、房屋、外移勞工、基礎教育以至專上教育，還有護老、護幼等等，都會因此而被私營化、外判化或者撤銷必要的管制。但是根據外國和本地經驗，私有化、外判化和撤銷市場管制總是伴隨着官員貪污、利益輸送、貧窮惡化、裁員減薪、惡性競爭等等惡果。勞動散工化這個政策導致不受保護又沒有就業保障的外移勞工不斷增加。這也引起中介商人如雨後春筍般發展，他們與勞工輸出國及輸入國的政府合作，公開地向外移勞工徵收高額費用。現在歐美更企圖把範圍再擴大到環境服務，同時進一步把非關稅的「貿易壁壘」（例如管制市場的勞動及環保標準）降低，也就是把更多公共服務和國計民生變為買賣發財的商品。我們對此表示反對。

- 2.6. 世貿向全球推行自由貿易，漠視了以下事實：一方面跨國公司今天已經強大到越來越能夠壟斷全球投資與貿易，使到源自十八世紀的自由貿易理論完全過時；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巨大而且還在不斷擴大的差距，使後者不可能同前者有真正的公平競爭。在這個情況下強行要後者廢除市場保護，同前者實行什麼自由貿易，只會令後者的財富向前者轉移。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有權保護其國內市場及本土工業，所以《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中種種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上述權利的規定必須廢除。其次，我們支援他們爭取削減歐美對其農業公司的出口補貼，反對世貿進一步擴大農業的自由貿易；支援他們把農業及漁業剔除於世貿之外，貫徹糧食安全與糧食主權。
- 2.7. 我們特別關注中國加入世貿後對勞動人民及環境的負面影響。官方也承認，將有千萬計農民因外國農產品的大量進口而經濟受損。在城市，中國企業為了應付入世後的激烈競爭，已經在許多經濟部門進行大規模的合併及裁員。由於中國政府不容許人民享有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更使勞動人民在面對中外企業的超級剝削的時候處於絕對劣勢，無力保護自己最起碼的合法權利。對勞動人民有害的制度卻對跨國公司有利，因為這種制度使勞工成本出奇的低，導致大量職位從其他地區（包括香港）流向中國。不論對於外地還是中國的勞動人民來說，這都是一種雙輸的局面。我們反對這種比賤邏輯，支援中國勞動人民提高待遇及得到就業保障，支援他們爭取結社自由和支援小農保護其生計。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扭轉全球比賤的趨勢。
- 2.8. 我們相信只有一個公平和包容性強的全球化，才能帶給基層人民安居樂業和可以讓他們的子女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因此，基層人民必須爭取有份參與制訂任何影響他們切身利益的協議或條約。同時，我們必須建立網絡和機制去連連每個地方人民的抗爭，透過交流和學習，使我們更能認清我們的共同敵人（即由跨國公司、多國政府及國際機構——世貿 / 世銀 / 國機會——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和支持不同地方的人民的不同需要和對發展模式的不同想象，進而建立共同的抗爭運動。這個立場書的目的是為各團體的合作提供共同基礎。
- 2.9. 我們歡迎任何認同本立場書的團體加入本聯盟。



## 附件三：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大事表 (陰影欄位為在港的活動，其餘則於外地舉行。)

日期	事件
2004年 1月	民間關注全球化及世貿的團體就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首次會面及討論民間如何回應。
9月22日	正式成立「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並通過聯盟的立場書（見附件二）。
12月1日	秘書處兩名全職統籌上任。
12月15日	工作坊（一）「世貿面面觀」：探討世貿的歷史與其十年發展。邀請「聚焦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代表 Nichola Bullard 主講，出席人數約七十人。
2005年 1月19日	首次約見政府，向工業貿易署表達對服務業貿易談判及進一步自由化的反對意見，要求增加談判透明度及設立香港在世貿談判狀況的匯報機制。 又與工貿署的世貿會議統籌辦公室代表討論抗議世貿的民間活動的安排。
1月23日	工作坊（二）「GATS與公退私進」：掌握世貿對基層人民及公務員在公共服務方面即將帶來的影響。針對服務業貿易自由化的討論及參與，邀請多名學者及工會代表主講及討論，出席人數約一百人。
1月26至31日	派代表到巴西出席世界社會論壇2005及為工作坊擔任主講，向國際民間社會簡介聯盟的目標及計劃。
2月26及27日	舉行國際協調網絡會議。來自多達八十個國家的團體及社運網絡的二百多名代表參與會議，擬定了全球民間回應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方式及日程。
2月28日	聯同國際團體代表與工貿署的世貿會議統籌辦公室代表會面，後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國際協調網絡會議的成果。
3月11日	工作坊（三）「CEPA——商機定就業危機？」：討論有關雙／多邊貿易協議及 CEPA（中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對本港及內地基層勞工的影響。邀請研究機構代表主講，出席人數約三十人。
3月底	在香港舉行東南亞漁民工作坊。
4月4-5日	在曼谷參加 G-CAP 全球減貧運動動員。
4月13日	工作坊（四）「TRIPS與民生：誰的知識？誰的產權？——TRIPS、知識產權與藥物價格」：探討有關知識產權協議如何剝削病人權益，以及民間關注知識產權及藥物的運動。邀請香港樂施會及無國界醫生香港分會代表主講，出席人數約五十人。
4月中旬	與國際工會網絡合辦題為「世貿協議對公共服務的影響——亞洲會議」的活動。

4月20日	工作坊(五)「TRIPS與民生：誰的知識？誰的產權？——點止翻版咁簡單！」：探討有關知識產權協議如何影響香港在版權法方面的改革。邀請民間團體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代表主講，出席人數約廿五人。
5月1日	派代表到古巴出席拉丁美洲反自由貿易協議聯盟的大會，向國際民間社會簡介聯盟的目標及計劃。
5月17至19日	派代表到瑞士日內瓦出席貿易與人權培訓工作坊及擔任講者，向國際人權團體簡介聯盟的目標及計劃，並與駐日內瓦民間團體會面。
5月20及27日	全球化教材推介會：向中學老師介紹與多個成員團體合作製作的「誰的全球化？」教材套，出席人數約三十人。
6月25及26日	與國際性別與貿易網絡(亞洲)及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合辦「香港婦女性別與貿易培訓」，從婦女組織者的角度探討世貿的問題，出席人數約四十人。
6月	派代表到斯里蘭卡出席南亞動員大會，向國際民間社會簡介聯盟的目標及計劃。
7月1日	參與七一大遊行。反對世貿黑箱作業，抗議官商勾結全球化。
7月中旬	參加孟加拉動員大會。
7月17日	在銅鑼灣舉行社區推廣活動。透過論壇、表演、派發單張、展板、小型巡遊等方式表達對世貿的批判，動員約200人參與推廣活動，並吸引大量行人參觀。
7月23日	與來港的韓國農民團體代表合辦記者招待會，向公眾說明世貿對農民的影響，發表對世貿的批評及行動意向。
7月24日	舉行「抗議世貿·反對官商勾結全球化」遊行。約二百人遊行至政府總部，反對政府黑箱作業及漠視基層權利，要求保障公平及符合公義的國際貿易。
7月26至30日	派代表到日本東京、大阪及橫濱參加動員大會。
8月18日	派代表到台灣出席抗議世貿籌備大會，向民間社會簡介聯盟的籌組經驗、工作目標及計劃。
9月初	派代表到日內瓦參加G-CAP全球減貧運動策略會議。
9月10日	舉行「世貿受害者：一個都不能多！」燭光紀念晚會，悼念2003年為抗議世貿而身亡的韓國農民李京海及其他因世貿而受害的民眾。
9月26日	工作坊(六)「你食咗乜？——全球化下的食品安全」：探討在全球貿易日益蓬勃的情況下，食品檢疫政策的發展及其與世貿的自由貿易協議之關係。邀請民間團體及食物環境衛生署代表主講。

「世貿受害者：一個都不能多！」  
燭光晚會(2005年9月10日)



10月1日	聯同全球聯陣發起「捍衛公營服務」大遊行，由灣仔修頓遊行至政府總部，反對官商勾結、外判化及私有化。
10月15日	工作坊（七）「亞洲農民之聲——交流論壇」：探討世貿如何影響農民的生計。邀請菲律賓、印尼、韓國、泰國、中國及台灣的農民團體代表及學者與會眾討論有關對策及抗爭運動，出席人數約一百二十人。
10月16日	出席世貿在港舉行的非政府組織圓桌會議。聯盟主席鄧燕娥擔任其中一名講者，多名聯盟代表參與發表意見。聯盟在場內及場外向世貿總幹事及政府官員抗議，反對世貿製造不公義及香港政府黑箱作業。
10月26至30日	派代表到泰國曼谷出席婦女與發展論壇（AWID Forum）舉行的動員工作坊。
11月12至19日	派代表到韓國出席抗議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活動，舉辦工作坊與國際民間社會協調抗議世貿活動的事宜。
11月17日	與獵奇行動合作，於旺角舉行社區推廣活動。透過街頭劇、藝術表演、單張、展板、小型巡遊等方式，表達對世貿的批判，引起公眾關注世貿造成不公平貿易的問題。
11月下旬	出版《我們為什麼抗議世貿？》小冊子，簡介世貿及多方面討論世貿對民生及香港的影響。
11月24日	與無國界醫生、樂施會及綠色和平等非政府組織聯合舉行記者簡介會。
12月11至18日	為回應世貿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舉行「抗議世貿！——民間活動週」。聯同世界各地的團體、網絡及民眾，以多元化的活動向公眾及出席世貿會議的代表展示人民的聲音及對世貿的批判。主要場地為維多利亞公園。多個團體在大會活動以外舉辦形形色色的主題討論、抗議及公眾活動。聯盟按各團體的需要，提供場地、物流、聯繫、糾察、救護、支援等各方面的協助。 12月11日：舉行「抗議世貿官商勾結」大遊行及文化表演。動員約四千人由維園遊行至政府總部，反對財團壟斷及基本民生需要商品化，爭取就業穩定、生活保障及人本經濟發展。 12月13日：舉行「人民力量捍衛尊嚴生活」集會、遊行，要求結束世貿所帶來的不公義，約五千人參加。 12月18日：舉行「繼續抗爭，向世貿說『不』！」集會、遊行，反對世貿協議出賣人民基本生活保障，要求公義社會、尊嚴生活及糧食自主，約五千人參加。

亞洲農民團體代表來港參與交流論壇（2005年10月15日）



<p>2005年12月19日 至2006年3月30日</p>	<p>發起「立即釋放世貿政治犯聲援行動」，反對港府政治檢控十四名抗議世貿人士及要求立即釋放。</p> <p>12月21至23日：聲援韓國全國農民會總聯盟發起的「三千叩首絕食聲援」行動。</p> <p>12月29日：聯同被控示威人士家屬遊行至政府總部抗議。</p> <p>1月5至11日：聲援被控的抗議世貿人士於天星碼頭進行的無限期絕食行動。協調及舉辦期間每晚的燭光晚會。</p> <p>1月8日：聯同海外聲援人士舉行「抗議世貿，要求釋放世貿示威者」遊行，約五百人參加。</p> <p>1月10及11日：統籌「港人團結聲援絕食」，超過一百人參與。</p> <p>3月12日：發起遊行，由銅鑼灣遊行至會展，一方面延續2005年遊行中未能完成的路段，以示繼續抗議世貿的決心，另一方面要求立即釋放被控的抗議世貿人士。</p> <p>除此以外，聯盟連同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及熱心人士統籌多個燭光晚會、展覽及文化活動，以行動聲援被控的抗議世貿人士。最終所有被控人士均獲撤銷控罪或無罪釋放。</p>
<p>3月19日</p>	<p>召開記者招待會，公佈與亞洲人權委員會共同草擬的一份報告。報告針對香港警方在民間抗議世貿活動期間的連串違反人權事件寫成，並呈交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有關香港的聆訊會議。</p>
<p>至今</p>	<p>與「全球聯陣——勞工基層大聯盟」合併，發展為一個以民眾運動團體為主軸的平台組織「監察全球化聯陣」（簡稱全球聯陣），持續關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及世貿等與經濟公義相關的議題，進行公眾教育、行動、倡議及國際連結等工作。</p>



轉型後的監察全球化聯陣，繼續批判全球化帶來的影響（2006年9月19日）







群眾到達官方劃定的示威區準備集會。那裡只能遙望舉行世貿部長級會議的會展中心（2005年12月13日）



示威群眾踏在代表「世貿黑手」的橫額上（2005年7月1日）



多個團體參與「捍衛公營服務」大遊行（2005年10月1日）



被控的抗議世貿人士發起無限期絕食（2006年1月5日）

2005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世界各地的民間組織聚集在一起，展開了抗議世貿的行動。期間，香港警方在一次韓農的抗議遊行中展開大規模的拘捕行動，因而衍生了一場罕見的政治官司.....

一個星期的世貿會議和民間抗爭，擦出了激烈的火花。那一連串的抗議行動雖然已經完結，但為了生存和維護公義的抵抗運動卻只是剛剛起步。

這本書記錄了：

- 抗爭活動的始末；
-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成立；
- 各國民間團體的聚合；
- 聯盟的公眾教育和傳媒策略；
- 抗議遊行如何演成政治官司和爭取釋放運動；
- 抵抗運動的發展前景。

售價：HK\$40

ISBN 962-8326-80-5



9 789628 326808



